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預刊）

第〇本，第〇分

出版日期：民國〇年〇月

「根如人形」與「三桠五葉」： 十七、十八世紀的人參圖像 與本草知識的全球流通

劉小朦*

十七、十八世紀，人參成為東亞醫學實踐中廣受追捧的補藥與全球貿易網絡中的重要商品，中、日、歐等地的醫家、本草學家與博物學家對其展開了不同角度的探索，而圖像則構成了知識生產與流通中的關鍵要素。本文以圖像為中心，嘗試考察人參知識在全球流傳過程中被表現、修改與固定的歷史過程。中國本草從宋代流傳的四幅本草圖中脫胎出兩種繪圖模式：一種以潞州人參圖為參照對象，輔以細節的修訂；一種以商品為描繪對象，呈現市場中的知識。江戶時代早期，日本本草學家主要通過中國本草書籍瞭解人參的植物形態；享保改革後，由於人參引種的需求，學者開始通過實地觀察經驗來繪製人參圖，但中國本草書中「三桠五葉」的記載仍廣泛影響了人參品種的確認與圖像呈現方式。歐洲博物學家則通過中文本草書和在日本的實地調查獲取了多種人參圖，在紛繁歧互的訊息中探尋人參的典型形態。在這一複雜的歷史過程中，圖像不僅是知識傳播的載體，更是知識生產的媒介。相較於歐洲對於圖像典範性和細節描繪的追求，東亞的人參繪圖更關注桠葉、根形與蘆頭等代表性的特點。這一製圖策略的差異也體現了近世東西方在認知層面的分流。在知識與圖像的全球傳播過程中，人參的名實也產生了重要變化。多種原本歸於「人參」、ginseng 或 ninzin 之下的植物品類被逐步排除出該品名之外，最終在全球知識互動之中五加科的 *Panax ginseng* C.A.Mey. 被固定為東亞唯一的真品人參。

關鍵詞：人參 圖像 三桠五葉 知識生產 全球史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清代藥物貿易與知識變遷研究」（23CZS039）的階段性成果。

三桠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椒樹相尋。

——高麗《人參贊》

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中記載的高麗《人參贊》最早將人參的植物形態描述為「三桠五葉」。¹ 北宋蘇頌的《本草圖經》更進一步描繪了人參的葉、花和果實，一度成為中國古代對人參植物形態最詳細的記錄，其中所繪四幅插圖也是目前傳世最早的人參圖像。² 明清時期，由於溫補之風的興起與清代的人參專賣制度，人參在醫療與政治中的地位凸顯，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人參方才成為東亞世界家喻戶曉的「神藥」。然而，人參雖在明清商業貿易與醫療實踐中異軍突起，同時期本草書籍對人參形態學的關注卻不及前代，相關記載多集中於入藥的根部，對莖葉花實的描述或因襲前人，或敘述簡略。這種人參知識的變化值得關注，而對植物形態學的描繪，圖像無疑比文字更為直接生動。那麼，人參在明清時代成為一種廣受追捧的滋補藥品和跨國商品之後，不同地區的醫家、本草學家、博物學家又是如何描繪這一物種的呢？本文便以圖像為中心，嘗試考察人參知識在全球流傳過程中被表現、修改與固定的歷史過程。儘管明代以前人參的植物基原仍存在爭議，但一般認為 16 世紀以後遼東、朝鮮半島等地所產之人參便是現今所用的五加科人參（植物學名 *Panax ginseng* C.A.Mey.）。然而歷史資料卻呈現出更為複雜的圖景，近世東亞乃至全球範圍內被稱作人參或 *ginseng* 的植物多種多樣，人參的真偽辨別也成為了當時市場中所流行的實用知識。與其將所謂「偽品」人參排除出人參史之外，不如轉而考察本草及博物學如何定義人參、如何將其他物種排除出「人參」品名之外、並最終將五加科人參確定為人參「真品」的歷史過程，其中圖像便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人參在近世東亞醫學史中有著重要的地位。日本學者今村鞆的七卷本《人參史》無疑是近代第一部開創性的作品，為東亞的人參歷史研究提供了首個範本及豐富的資料。³ 二十世紀末中外歷史學者多關注清代的人參專賣制度，重在檔案資料的整理及政治史視角的考察。⁴ 醫療社會史興起後，藥物的物質文化史成為

¹ 「三桠五葉」描述的是人參植株的掌狀複葉特徵，在現代植物學描述中，人參一般具備 2-6 枚複葉，每枚複葉生有 3-5 片小葉。「三桠五葉」即三枚複葉、每枚生五片小葉。

²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376-387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據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晦明軒刻本影印），卷 6，頁 11a-b。

³ 今村鞆，《人參史》（京城：朝鮮總督府專賣局，1935）。

⁴ 宋抵、王秀華編，《清代東北參務》（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Van Jay Symons,

近十年來新的增長點，蔣竹山的《人參帝國》是其中的傑出代表，該書從制度社會史與消費文化史的視角考察清代人參管理、貿易與消費，並提出了藥物全球史的新方向。⁵ 的確，人參是最適合進行全球史研究的案例之一，它在近世中、日、朝三地的醫學實踐中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金宣叟以人參為切入點，考察清朝與朝鮮王朝的政治與外交關係；田代和生研究江戶日本對朝鮮的藥材調查，人參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品種。⁶ 人參亦曾吸引了諸多歐洲博物學家的目光。⁷ 韓琦關注到法國耶穌會士在將人參引介到歐洲和西洋參發現中的重要作用。⁸ 栗山茂久則將耶穌會士的引介、西洋參的發現、江戶日本的人參引種串聯在一起，講述了人參知識與貿易在近世全球進程中的獨特角色。⁹ 薛惠心從全球史的視角考察了人參商品、知識的全球流動以及採參者的形象建構。¹⁰ 不過，這些研究或未涉及圖像材料，或未把圖像材料置於分析的核心。方曦閏專研中西視覺文化交流，在《華夏圖志》中搜集了多種歐洲文獻中出現的人參圖，然並未對圖像與知識的源流進行詳細辨析。日歐文化交流史專家沃夫岡·米歇爾（Wolfgang Michel）在最新研究中追溯歐洲人對人參的認知過程，搜集史料極為豐富，雖然文中也展示諸多人參圖，但並未針對圖像進行專門分析，也未能充分關注到「人參」名下植物品種的複雜性。¹¹

Ch'ing Ginseng Management: Ch'ing Monopolies in Microcosm (Tempe: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1).

⁵ 蔣竹山，《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⁶ Seonmin Kim, *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on Korea, 1636-191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田代和生，《江戶時代朝鮮藥材調查の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1999）。

⁷ Hyemin Lee, "Louis XIV's Ginseng: Shaping of Knowledge on an Herbal Medicine in the Late 17th and the Early 18th Century France," *Uisihak: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25.1 (2016): 111-146.

⁸ 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三章。

⁹ Shigehisa Kuriyama, "The Geography of Ginseng and the Strange Alchemy of Needs," in *The Botany of Empir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ed. Yota Batsaki et al. (Washington, DC: B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16), pp. 61-72.

¹⁰ Heasim Sul, *A Global History of Ginseng: Imperialism, Modernity and Orient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¹¹ 方曦閏，《華夏圖志：西方文獻中的中國視覺形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頁 169-180；沃夫岡·米歇爾，〈歐洲人與人參（1600-1740）：知識傳播與意義建構〉，《中醫藥歷史與文化》1.1（2026）：93-117。

本草圖像一直是傳統本草史研究的重要關注點之一。但由於中國古代本草圖像質量參差不齊，加之古今物種的名實對應不同，更增加了研究的難度。近來醫史研究者開始超越植物基原鑑定的思路，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思考本草文獻中的圖像。鄭金生將古代本草圖像分為寫實插圖與藝術插圖兩類，王家葵等對《本草綱目》插圖的研究指出其對前代插圖的模仿與修改，陳明通過《本草品彙精要》中的胡人圖探討明代對域外本草的認識，梅泰理（Georges Métaillé）比較手繪與版刻本草圖在表現植物中的異同。那段（Carla Nappi）通過《本草原始》的插圖論述圖像在人參「客觀化」進程中的作用。¹² 以上代表目前對中國本草圖像研究的三種取向：不同類型圖像體現的繪圖理念；本草圖像的改繪與流變；圖像與知識生產。

早期人參圖像研究多集中於《證類本草》所存四種宋代人參圖的辨析，其中僅有潞州人參較為符合現今所用之五加科人參，這充分體現出古代藥物品種流變的複雜性。王家葵對人參圖進行長時段考察，詳細分析宋、明、清三代出現的本草圖像及其繪製特點，但在所附 21 幅圖中，絕大部分產生自《本草綱目》之前。¹³ 但此後的十七、十八世紀無疑是人參史中最為重要的節點。明朝後期人參主要產地轉移到遼東，清朝入主中原後建立起了人參專賣制度，但隨著民間需求的擴大，自然資源枯竭，最終導致了十九世紀秧參的崛起。¹⁴ 人參也是中、日、朝三國之間正式與非正式貿易中的大宗貨品。¹⁵ 享保改革之後，日本德川幕府開始推進人參的國產替代策略以挽救白銀外流導致的財政惡化。也正是在此時期，歐洲傳教士、博物學家開始從東亞帶來關於人參的訊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杜德

¹² 鄭金生，〈論本草書中的寫實插圖與藝術插圖〉，王淑民、羅維前主編，《形象中醫：中醫歷史圖像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頁 83-89；王家葵、蔣淼、胡穎翀，《本草綱目圖考》（北京：龍門書局，2018）；王家葵，《《本草綱目》通識》（北京：中華書局，2023）；陳明，〈異域的形象：《本草品彙精要》中的胡人圖〉，王淑民、羅維前，《形象中醫》，頁 101-110；Georges Métaillé, “The Representation of Plants: Engravings and Paintings,” in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ed. Francesca Bray et al. (Leiden: Brill, 2007), pp. 487-520; Carla Nappi, “Surface Tension: Objectifying Ginseng in Chinese Early Modernity,” in *Early Modern Things: Objects and Their Histories, 1500-1800*, ed. Paula Findle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31-52.

¹³ 王家葵，〈本草人參的圖像學考察〉，《美術大觀》2022 年 7 期：95-99。

¹⁴ 蔣竹山，《人參帝國》，頁 114-147。

¹⁵ 田代和生，《近世日朝交通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 年》（東京：創文社，1987）。

美（Pierre Jartoux, 1669-1720）的書信甚至間接促成西洋參的發現。儘管如此，為何十七、十八世紀中國產生的人參圖像如此之少呢？或者說，真的很少嗎？中國之外，人參圖像也在日本、歐洲廣泛流傳，成為域外瞭解人參知識的重要載體。朝鮮半島雖是人參的重要產地，但筆者尚未見到在此時段出現的人參圖像，因而未能納入考察。這一現象的成因較為複雜，在結語部分會提出可能的解釋。此外，我並不將考察範圍嚴格限制於十七、十八世紀，考慮到歷史的延續性，也涉及到少部分十六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文獻，而最核心的材料則出現在 1640 年至 1770 年之間，這也大致對應了東亞歷史進程中的「近世」（early modern）。

本文同樣參考了歐洲近世科學史中對科學圖像的分析策略。相較於東亞傳統本草書籍，歐洲近世博物學作品中圖像的數量與地位逐步增長，相關研究也層出不窮。¹⁶ 洛蘭·達斯頓（Lorraine Daston）在她關於科學圖像與科學客觀性的經典研究中指出，近世歐洲植物學圖像中表現的「自然真理」（true-to-nature）不應被視為任何一株特定植物的如實描繪，而是一種典範，一種通過博物學家觀察與研究總結出的典型形態。¹⁷ 她將這種圖像稱為「認知型圖像」（epistemic image）：「認知型圖像的製作不僅是為了描繪科學研究的客體，也是為了取代它。一個成功的認知型圖像會變成一種科學操作的客體、一種千變萬化的自然事物的替代品、並可被分散的博物學家社群所共享。」¹⁸ 這一視角提示研究者：儘管自然事物客觀存在，但如何去表現和描繪這種客觀性卻是一種知識、思想和行動。雖然近世東亞對人參圖像描繪的方式與歐洲有所不同，但圖像仍舊成為了跨文化知識交流的重要載體與中介。而圖像在不同文化中的呈現方式亦是本文分析的重點。相較於歐洲對於圖像典範性和細節描繪的追求，東亞的人參繪圖更關注樞葉、根形與蘆頭等代表性的特徵，這一製圖策略的差異體現了近世東西方在認知層面的分流。總之，對人參圖像的考察不僅是植物學史的一環，更與當時的社會、思想與文化環境息息相關。

¹⁶ Alexander Marr, "Knowing images," *Renaissance Quarterly* 69.3 (2016): 1000-1013.

¹⁷ 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2007).

¹⁸ Lorraine Daston, "Epistemic Images," in *Vision and Its Instruments: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Alina Payn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35.

從植物到商品：明清中國的人參圖

十六世紀後半葉至十七世紀前半葉是中國人參圖像出現的高峰期，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並不意外。明末出版業的興盛導致各式插圖本書籍的出現，通俗小說和日用類書中的插圖最早吸引研究者的注意。¹⁹ 此外，明末技術類文獻中亦有眾多插圖，從醫書、本草到天文、地理類書籍，各種插圖的出現不僅可吸引讀者，也起到輔助文本理解的作用。《本草綱目》與《天工開物》無疑是明末出現的兩部最重要的技術類文獻，其中亦附有大量插圖。然而《本草綱目》繪圖的質量廣受非議，《天工開物》對技術的描繪也是社會性重於技術細節。²⁰ 有學者從書籍史與消費文化視角出發，認為這類圖像的娛樂功能大於實際的技術指導功能；近來技術史學者的研究則糾正以往消費文化和物質文化研究中過度解讀的傾向，重新將插圖帶回技術文獻的脈絡中。²¹ 梅泰理也對《本草綱目》進行個案研究，他認為即使圖像繪製粗糙，但與文本對照，仍有著輔助記憶與理解的功能。²²

何谷理（Robert E. Hegel）在研究明代通俗小說插圖時指出了其中反覆出現的圖像表現形式，它們有特定的來源，且具備穩定性和一致性，為讀者帶來了熟悉感和舒適的閱讀體驗。²³ 這種「圖像規範」（iconographic convention）在本草插圖中同樣存在。毫無疑問，明清人參圖最重要的範本便源自於宋代《本草圖經》中的四種插圖，分別為潞州人參、兗州人參、滁州人參、威勝軍人參，其中亦記錄了人參的植物形態及生長過程：「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椹五葉；四、五年後生兩椹五葉，未有花莖；至十年後生三椹，年深者生四椹，各五葉，中心

¹⁹ Robert E.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raig 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²⁰ 對《天工開物》圖像的解讀，參見 Dagmar Schäfer, *The Crafting of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chapter 4。

²¹ Francesca Bray,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and Georges Métailié, eds.,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Warp and the Weft* (Leiden: Brill, 2007); Peter J. Golas, *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²² Métailié, "The Representation of Plants," pp. 487-520.

²³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pp. 216-270.

生一莖，俗名百尺杵……根如人形者神。」²⁴ 此段將「三桠五葉」的典型描述賦予時間性的變化，因而在圖像描繪中往往會有不同「桠」數出現。潞州人參圖以四桠表現「年深」之人參，成為後世插圖最常模仿的範本。

《本草圖經》原圖不存，宋代官方纂修的多部綜合性本草目前僅有金、元、明等後世重刊本存世，其中《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下文簡稱《政和本草》）、《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下文簡稱《大觀本草》）、《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下文簡稱《紹興本草》）中的圖像雖略有差異，但基本保存了宋代圖像的原貌（圖 1）。前兩者曾在明代多次重刻，其中的插圖成為明後期本草插圖的重要參考對象。²⁵ 明太醫院纂修之《本草品彙精要》參照宋代人參圖彩繪而成；《三才圖會》模仿潞州人參與威勝軍人參圖，並輔以藝術化處理，繪製成植物野外生長的狀態（圖 2）；《本草蒙筌》則摹繪了潞州與威勝軍人參圖（圖 3）。²⁶ 《新刻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與《鼎雕徽郡原板合併大觀本草炮製》兩書的人參圖像完全一致，皆改繪自兗州人參圖，將原本出於同一根部的三條枝幹繪成三個分立的植株，並減少葉片數量（圖 4）。²⁷ 兩書分別由陳氏積善堂與鄭氏書林寶善堂刊行，皆屬建陽書坊，內容抄撮流行的本草書籍，且圖版幾乎一致。從版刻角度來看，兗州人參圖較之其他三者不規則曲線較少，缺乏葉脈和花絮的細節造型，對刻工技藝要求更為簡單。作為謀利的出版物，自然不重視圖像的準確性。²⁸

²⁴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 6，頁 11a-b。

²⁵ 李健、張瑞賢、張衛、梁飛，〈明代坊刻《政和本草》版本研究〉，《中華醫史雜誌》41.3（2011）：176-178。文中指出明代坊刻的諸多《大觀本草》，實際所據底本仍為《政和本草》。

²⁶ 王圻、王思義編，《三才圖會》（明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草木卷 1，頁 4a；陳嘉謨，《圖像本草蒙筌》（明崇禎元年萬卷樓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 1，頁 3b。

²⁷ 王文潔彙校，《新刻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明萬曆十年陳氏積善堂刊本，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藏），卷 1，頁 1a；陳三友校正，《鼎雕徽郡原板合併大觀本草炮製》（明萬曆三十一年鄭氏書林寶善堂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 2，頁 2a。

²⁸ 關於明清出版的各類本草書籍，參見 He Bian,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建陽坊刻參考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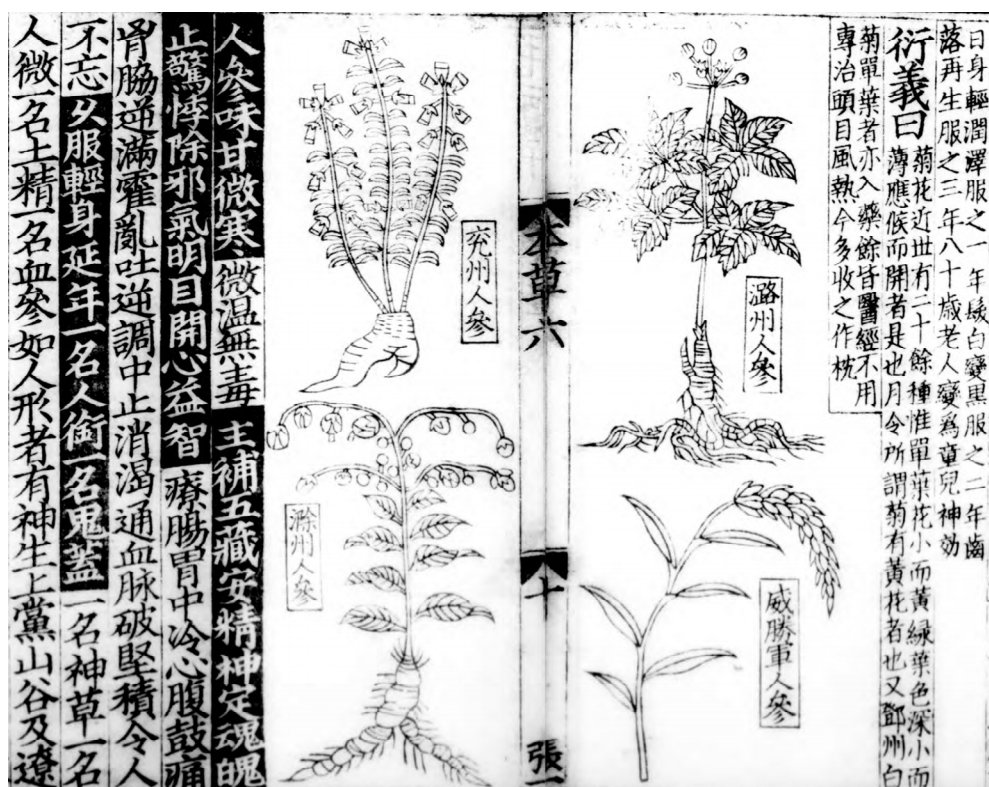


圖 1：宋代人參圖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 6，頁 10）



圖 2：人參圖

（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草木卷 1，頁 4a。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圖 3：人參圖

（陳嘉謨，《圖像本草蒙筌》卷 1，頁 3b。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 4：人參圖

（陳三友，《鼎雕徽郡原板合併大觀本草炮製》卷 2，頁 2a。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中國出現的諸種人參圖基本未脫離宋代出現的範本，或四圖皆取，或擇其一二。但這種圖像生產模式在《本草綱目》之後發生重要變化，李時珍對宋代圖像的準確性提出質疑：「宋蘇頌《圖經本草》所繪潞州者，三桠五葉，真人參也；其滁州者，乃沙參之苗葉；沁州、兗州者，皆薺萵之苗葉。」²⁹ 或因如此，其子李建元在為人參製圖時僅參照潞州人參圖（圖 5）。王家葵注意到金陵本《本草綱目》在人參根莖之間添繪類似蘆頭的部分，可算是一個重要變化。³⁰ 宋代及以前的本草書對人參蘆頭的記載寥寥無幾，僅在方劑中註明人參需去蘆使用；自元代始對人參與蘆頭的藥性明確區分，李時珍亦在人參條後附列「蘆」之藥性與發明。³¹ 由此可見，本草圖像的繪製雖參考前代插圖，但亦有對新知的補充。自此，一個新的人參「圖像規範」產生了。雖然《本草綱目》人參圖對原「潞州人參圖」有著明顯的模仿痕跡，比如整體風格以及「四桠五葉」的形態，但它卻有著幾個突出的特點：首先，增加蘆頭；其次，省略根部細小的參鬚，主根外保留一個支根，形成「兩腳」的形象；再次，輪生的四桠改

²⁹ 李時珍，《本草綱目》（明萬曆二十一年金陵胡承龍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 12，頁 10b。

³⁰ 王家葵，《本草人參的圖像學考察》，頁 97。

³¹ 李時珍，《本草綱目》（明萬曆二十一年金陵胡承龍刊本），卷 12，頁 17a。

為互生狀態，雖與實際形態不符，但避免桎葉錯落遮擋的狀態，在刻版時更為簡易；最後，莖部頂端花序繪製為五支，左右兩支為開花形態，中間三支明顯不同，可能描繪的是花苞或結實的形態（圖 5）。³² 1640 年武林錢衙本對圖像進行修飾，除了整體風格更為精緻，在主根中上部增添兩條支根，形成類似人形的根部形態（圖 6）。³³「根如人形」是自《名醫別錄》起便被本草文獻反覆提及的上等人參形態，錢衙本插圖明顯為了呈現這一理想形態而修改。在晚明清初出現的諸多本草圖像中，錢衙本人參圖成為主要的模仿對象。

十八世紀文獻中對錢衙本人參圖改繪最有趣的例子出現於陸烜的《人蔘譜》。陸烜（1737-？），字子章，浙江平湖人，早年因科舉失意，遂致力於藏書著書。他雖略通醫術，對人蔘的興趣卻始於偶然的生病求醫經歷。該書完成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收入陸氏自刻之《梅谷十種書》，內容蒐集各類典籍中的相關記載，甚至選用了更為古雅的「蔘」而非常用的「參」作為標題。這部書顯然有著強烈的文人博物趣味，並無太多實用性的考量。正文前附有一幅「人蔘圖」，左下標註為「陸鈴元真寫」。陸烜工於書畫，為其作品繪圖並不意外。然而他生平從未至遼東，所繪之圖不可能基於親眼所見，此處「真寫」應意在強調作者而非說明圖像是基於真實植物的描繪，繪圖風格也更注重審美情趣而非形態的準確。稍作對比便可發現陸烜之圖主體應仿繪自錢衙本人參圖：他在主根添繪分支以像人形，略彎曲的枝幹更似傳統花鳥畫中的植物形態，並將四桎改為五桎，左上最小的一枚桎葉更似為添補枝幹空白處而刻意增加的元素，由此整體桎葉表現更為錯落有致（圖 7）；而蘆頭上增添的類似嫩芽部分則是個別明代坊刻本中潞州人參圖的特徵（比如圖 3）。³⁴ 經過這些細節上的修飾，圖像整體看來更為精緻，但卻愈發遠離人蔘實際的植物形態和當時流行的知識。

³² 有學者以現代植物學中的傘房花序與傘形花序來區分不同人參圖對花序的描繪，不過我認為明代醫家尚未對人參花序有如此細緻的觀察，其繪製多顯隨意，但分支數量以及花與花苞或果實的區分卻很明顯。

³³ 李時珍，《本草綱目》（日本江戶覆刻明崇禎武林錢衙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圖卷上，頁 14a。

³⁴ 陸烜，《人蔘譜》（收入《梅谷十種書》，清乾隆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卷首圖。雖然現代植物學指出五桎人參確實存在，但清代及以前的本草書中從未提及五桎人參，陸烜所輯錄的材料亦無任何五桎人參的記載。筆者所見十八世紀之前唯一提到五桎人參的是一位朝鮮文人金時習，相關詩作收入朱彝尊《明詩綜》：「一叢枸杞花初偏，五桎人參葉已齊。」見朱彝尊，《明詩綜》（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卷 95 下，頁 7b。此外，康熙朝畫師蔣廷錫與班達里沙所繪《畫人參花》圖中，亦描繪有五桎人參。見林莉娜，〈班達里沙、蔣廷錫《畫人參花》：康熙宮廷百草之王〉，《故宮文物月刊》343（2011）：69-78。



圖 5：金陵本

《本草綱目》人參圖

（李時珍，《本草綱目》〔明萬曆二十一年金陵胡承龍刊本〕，附圖卷上，頁 9a。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 6：錢衙本

《本草綱目》人參圖

（李時珍，《本草綱目》〔日本江戶覆刻明崇禎武林錢衙本〕，圖卷上，頁 14a。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圖 7：

陸鈴元真寫人蔘圖

（陸烜，《人蔘譜》卷首。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明清人參圖像的另一個「圖像規範」出現於李中立的《本草原始》（初刊於 1612 年）。該書插圖與其他明代本草有著較為重要的區別，多集中描繪藥用部分而非植物全株。根據序文，該書的插圖為作者親手所繪，其中對人參的描繪尤為精細。李中立描繪一株想像中的人形人參，一株人參的根部形態，以及三幅市場中商品人參的正、側面繪圖。對於根部，作者保留經典的「兩腳」形態，並著重描繪皮上的紋路和蘆頭；而商品人參則刻意突出紋路以及繩縛所形成的凹痕（圖 8）。³⁵ 天啓四年（1624）成書的《本草彙言》在清初刊刻時便摹繪了部分圖像。³⁶ 清代醫家何鎮的《本草綱目類纂必讀》同樣採用其中的人參商品圖。³⁷ 《本草原始》在明清兩代多次重刊，乾隆十九年（1754）存誠堂將雷公炮製內容

³⁵ 李中立，《本草原始》（明崇禎永懷堂刊本，麻薩諸塞州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卷 1，頁 46a-b。

³⁶ 倪朱謨，《本草彙言》（清順治二年有文堂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 1，頁 1a。

³⁷ 何鎮，《本草綱目類纂必讀》（清康熙十二年古延毓麟堂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11，頁 1a。

劉小蓀

補入，以《本草原始合雷公炮製》為題重刊，其中圖像大多摹繪自原版，但對人參圖有了部分修改。人參根部圖省略了皮紋，卻對蘆頭進行了重新刻畫，甚至以兩個弧形線條勾勒出蘆頭之上的蘆碗。³⁸ 商品人參圖由三個增加為四個，標示出原版文字中提及的「金井玉闌」式紋路，並將人參頭尾分製兩圖（圖 9）。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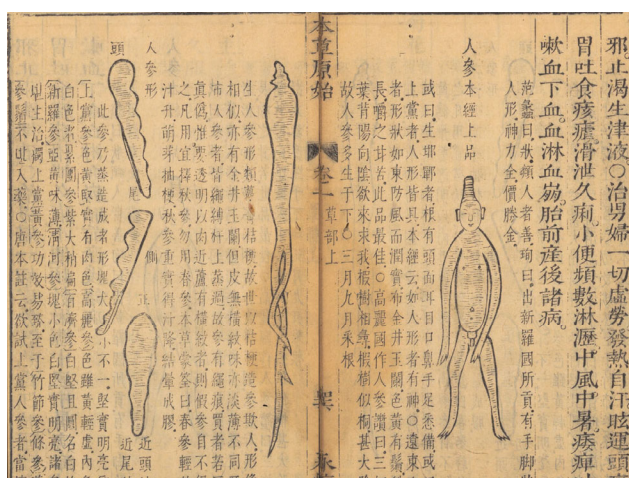


圖 8：人參商品圖

（李中立，《本草原始》卷 1，頁 46a-b。

Courtes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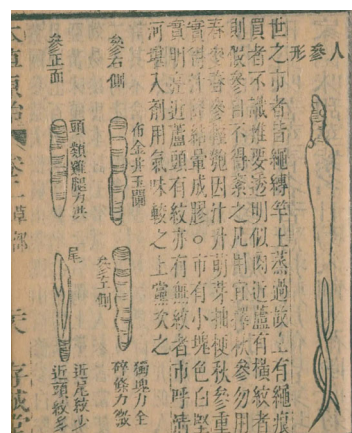


圖 9：人參商品圖

（李中立，《本草原始合雷公炮製》卷 2，頁 28a。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除了對明末諸種人參圖的轉繪、改繪，清代本草書籍的人參圖像並沒有出現新的形式。清代雖然出現了多種人參商品指南書籍，但大多並未附圖，現存唯一例外是鄭昂的《人參圖說》。⁴⁰ 光緒《鄞縣志》載：「案昂字軒哉，武生。是書辨別真偽，破中肯綮。」⁴¹ 鄭昂雖為武生，但書中稱「是圖所著皆余數十年閱歷

³⁸ 人參地上莖每年秋季枯死，第二年春季長出新芽，這一過程會在蘆頭處留下凹痕，通稱蘆碗。

³⁹ 李中立，《本草原始合雷公炮製》（清乾隆十九年存誠堂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 2，頁 28a。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楊素卿重梓《圖像本草原始合雷公炮製》中的人參圖像與存誠堂版相似，但刻工較為粗劣。

⁴⁰ 關於人參商品指南的研究，參見蔣竹山，《人參帝國》，頁 213-234。

⁴¹ 張恕等修，光緒《鄞縣志》（清光緒三年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 55，〈藝文志〉，頁 45b。

揣摩所得」，由此可推測他很可能以販賣人參為生。此書嘉慶七年（1802）由荻浦書屋刻版刊行，但流通範圍有限。⁴²《人參圖說》內容大致分兩部分：前十三頁為文字內容，記述各類人參的實用知識，述其地道、形體、氣味、皮紋、神色、蘆蒂、粳糯、空實、堅鬆、糖滷、鑲接、鉛沙、真偽；後三十五頁則為圖像，按產地與品質分為 45 種，每類附圖數種至三十餘種不等，共計 648 種。鄭昂所繪圖像雖多，但大致有規律可循，45 種類型先以寧古臺、船廠、鳳凰城三處產地劃分，每處產地按人參品質高下分為光紅熟參、兼皮熟參、糙兼參、粗糙參 4 類，每類又細分大、中、小 3 種規格，以上共 36 種，最後附以 9 種劣等人參。對比同時期人參商品指南，唐秉鈞〈人參考〉與黃叔燦《參譜》中對人參商品的分類與規格記載繁雜而無規律，鄭昂的分類更為明晰、便於記憶，他試圖用自身的經驗給出更加實用的人參鑑別體系。⁴³

通過圖像展現人參品質特徵是鄭昂最為著力之處，他所繪製的並非人參的原植物，而是市場上所見的經過加工炮製後的商品人參，即現今所謂之紅參。作者並未揀選出少數有代表性的個例，而是盡量列舉其多樣形態。鄭昂很清楚圖像的限制，他說：「參之美惡，有形可繪者具圖之，糖滷辨之在神色，臭味非筆墨所可傳。」⁴⁴ 因此，他所繪製的墨線圖最為著重描繪的是人參的外在形態及皮紋。在形態上，鄭昂仍然有著市場上普遍存在的對人形人參的推崇，每處產地最優等人參仍然描繪成類人形態（圖 10 ①）；但除此之外，他最為關注的是人參體態的圓潤度與分支的多少：最優質的人參特徵為「圓短紅熟」與「單枝獨餘」；而次等人參則是「釘頭鼠尾」與分支較多（圖 10 ②③）。皮紋是鄭昂人參分類的另一主要標準，在他的經驗裡皮紋的粗細、長短、軟硬、深淺、橫豎等差異皆可體現品質。他當然知道市場中人參重要的鑑定標準是神色、粳糯、堅鬆等依靠墨線圖無法呈現的質地特徵，但他卻將人參的內在質地與外表形態、皮紋聯繫起

⁴² 鄭昂，《人參圖說》（清嘉慶七年荻浦書屋刊本，寧波：天一閣藏）。另有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抄本，因天一閣藏本尚未完成修復及數位化，此處暫附抄本圖像，經筆者比對，兩者內容、圖像基本一致，但抄本缺卷首序言。詳細的版本及內容考察，參見拙文，〈參之美惡，有形可繪：鄭昂《人參圖說》的商品分類與繪圖策略〉，《中醫藥歷史與文化》第 8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6），頁 157-180。

⁴³ 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 7，〈人參考〉，頁 4b-9a；黃叔燦，《參譜》（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6-10。

⁴⁴ 鄭昂，《人參圖說》（抄本，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凡例〉。

劉小蓀

來，這在當時的人參商品指南中是絕無僅有的。從中可以看出以圖像為中心的呈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他對自身經驗和知識的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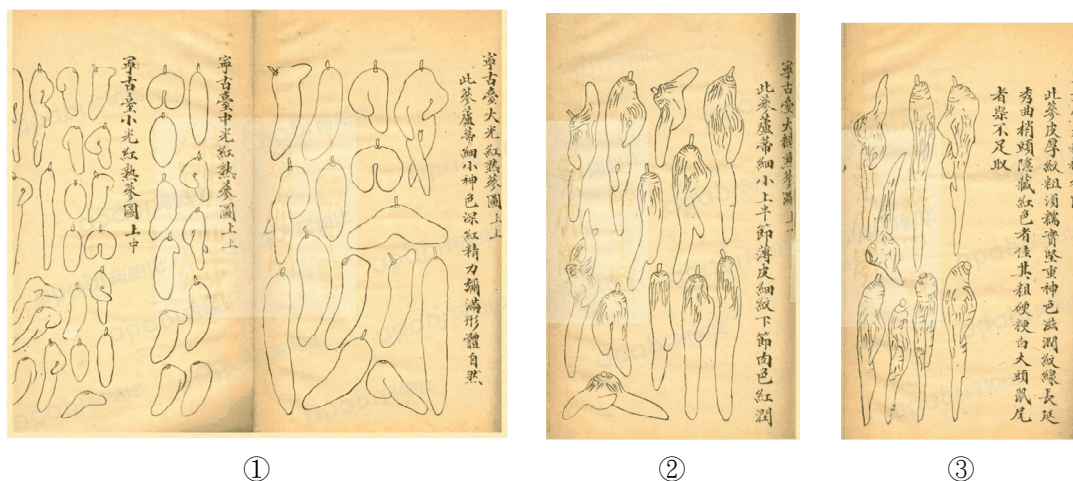


圖 10：各類人參商品圖

（鄭昂，《人參圖說》〔抄本〕。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綜上所述，從十六世紀末到十八世紀，中國人參圖繪有兩條較為明晰的線索：一是從對宋代四種人參圖的摹繪過渡到以潞州人參圖為主要模仿對象；二是從人參植物形態的描繪轉為商品人參的描繪。這種人參圖像的呈現方式也與明末清初的社會現實密切相關。自從晚明上黨人參絕跡後，遼東與朝鮮半島成為正品人參最重要乃至唯二的產區，而兩地則是身處漢地的醫家、學者所難以涉足的，他們無法通過實地考察獲得人參形態相關的知識。因此，明清本草中的人參插圖多因襲前代圖像及文獻記載。儘管文獻記載人參植株的典型形態為「三桠五葉」，年深者可長「四桠」，但絕大多數圖像都沿襲了宋代出現的四桠形態。這些醫家、學者所能親見的，則是市場中的商品人參，從明至清，對人參商品形態的文字與圖像描繪逐漸細緻。同時，「根如人形者神」的傳統觀念仍具影響力，多數人參圖像根部皆繪製了類似人形的「兩腳」形態，儘管《人參圖說》中提到「單枝獨餘」——也就是無任何支根的圓潤紡錘形態——才是實踐中最受青睞的上等人參。

從書本到實地觀察：江戶日本的人參圖

目前可知最早傳入日本的人參圖像出自平安時代真言宗高僧亮阿闍梨兼意（1072-?）所著之《藥種抄》，圖文皆本自宋代本草。隨後的幾百年間，日本並未出現新的人參圖像。這一方面由於當時日本並不出產人參，另一方面則因人參在醫療實踐中尚未普及。隨著十六、十七世紀中國、朝鮮醫書的大量傳入，使用人參的風氣也在江戶日本日漸流行。⁴⁵ 不過，日本本草學家對人參陡然增長的興趣不僅源於醫療文化的變遷，也與近世日本的政治、經濟形勢密切相關。

十七世紀日本主要從朝鮮半島進口人參，地處日朝之間的對馬藩幾乎壟斷了兩國間的人參貿易。到十七世紀後期，日本每年從朝鮮進口的人參少則數百斤、多則數千斤，考慮到對馬藩隱瞞交易數額和走私貿易的存在，真實數字往往會更高。不過，元祿、寶永年間人參進口數量開始出現下降趨勢，人參進口價格也在元祿十一年（1698）後迅速走高，短短十年接近翻倍。這與元祿丁銀的含銀量下降有關，朝鮮也一度因此暫停了兩國的人參貿易。⁴⁶ 但日本國內人參需求居高不下，幕府最終在寶永七年（1710）專門鑄造了含銀量達 80% 的「人參代往古銀」以恢復人參進口。⁴⁷ 正德五年（1715），在新井白石（1657-1725）的提議下，幕府開始推行「正德新例」，限制銀、銅等金屬出口。在此背景下，巨大人參貿易量導致的白銀外流成為新井白石難以容忍的現象，在改革國內貨幣鑄造的同時，他也計劃將購買朝鮮人參的白銀配額減半，並通過在長崎加大「唐人參」的進口來彌補國內需求。⁴⁸

人參因其在社會中的流行度受到日本本草學家的關注。十七世紀以《本草綱目》為代表的中國本草書籍大量傳入日本，成為日本學者瞭解人參圖最初的途徑。⁴⁹ 筆者所見江戶時期最早包含人參圖的本草書為下津元知的《圖解本草》，

⁴⁵ 江戶時代中國醫書傳日的歷史，參考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

⁴⁶ 田代和生，《近世日朝交通貿易史の研究》，頁 285-290。

⁴⁷ 田谷博吉，《近世銀座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

⁴⁸ 田代和生，《江戶時代朝鮮藥材調查の研究》，頁 55-60。

⁴⁹ 中國本草書傳日年代參見真柳誠、友部和弘，〈中國醫籍渡來年代總目錄（江戶期）〉，《日本研究》7（1992）：151-183。《本草綱目》對日本的影響，參見 Federico Marco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chapter 1。

該書刊於貞享二年（1685），內容多摘錄中國的《本草綱目》、《本草原始》、《本草洞詮》等書，但他卻根據自己採藥的經驗，繪製了諸多本草圖像，甚至將中日品種進行對比。其中的人參圖有所不同，左側圖明顯模仿自《本草綱目》；右側圖來源尚不明確，根部有著略顯誇張的分支形態，似並非根據真實植物描繪的圖像（圖 11）。⁵⁰ 同時代的稻生若水（1655-1715）是當時最出名的本草學家之一，他在正德四年（1714）出版了校閱本《本草綱目》。當時日本本草學者對《本草綱目》附圖的準確性及繪圖質量多有批評，稻生若水因而將原圖刪去，又自編《本草圖翼》四卷附於其後。不過，他所刻本草圖皆篩選自其他中國本草書，其中又以《本草原始》和《本草綱目類纂必讀》為最重要的參考。其中人參圖便取自《本草原始》（圖 8），無論圖像和配文皆與原版一致。⁵¹

在享保六年（1721）之前，對中國本草圖像的改繪、摹繪較為常見，且不僅出現於本草書中。在正德五年（1715）出版的《和漢三才圖會》中，人參根部圖與《本草原始》相似，而人參植物圖則仿自明朝的《三才圖會》，因後者未繪製根部，作者粗略地將根部畫成了細長的橫生狀態（圖 12）。⁵² 享保四年（1719）出版的《唐土訓蒙圖彙》中收錄之人參插圖（圖 13）與陸烜《人蔘譜》的圖繪（圖 7）相似，皆呈現了十八世紀少見的「五桠」人參，但其出版時間卻早於後者；觀其頂部花絮形態及根部紋路分佈狀況與錢銜本《本草綱目》之人參圖（圖 6）最為相似。該書插圖由檜村有稅子（又名橘守国，1679-1748）繪製，他師從狩野派，是江戶時期大阪畫壇的重要代表。他對錢銜本人參圖的改繪與陸烜不謀而合：兩人皆將植物整體繪製為略呈彎曲形態，並在因莖幹拉長導致的空白處添繪一小桠；另將錢銜本人參圖中幾乎與主根分離的「蘆頭」與根部更為自然地融合為一體。這一方面展現了畫家對本草插圖的藝術性修飾；另一方面說明當時中日畫壇對植物繪圖有著類似的審美觀點。⁵³ 上述諸種圖像多採自明清書籍，卻從未出現宋代的本草圖，這與日本所能接觸到的中國書籍有關。《證類本草》雖早

⁵⁰ 下津元知，《圖解本草》（貞享二年田中理兵衛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 2，頁 4b。

⁵¹ 稻生若水，《本草圖翼》（正德四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1，頁 1b-2a。

⁵² 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正德五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92，頁 2b。

⁵³ 平住專庵、檜村有稅子，《唐土訓蒙圖彙》（享保四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11，頁 2a。關於檜村有稅子及其作品，參見仲田勝之助編校，《浮世繪類考》（東京：岩波書店，1941），頁 73-75。

在 1639 年已傳入日本，但僅存於御文庫中，直到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後坊刻本的《政和本草》、《大觀本草》方才在日本社會流傳。⁵⁴ 在此之前，稻生若水是少數在作品中引用過《證類本草》的學者，這或許與他曾奉命為幕府編纂《庶物類纂》有關。他參閱過大多數明末清初的插圖本本草書，最終選擇《本草原始》的人參圖，也在側面體現了他的謹慎態度：他僅能確定人參根部形態的真實樣貌，而莖葉花實卻存在多種不同的圖繪形式，他一時也難以做出準確選擇。



圖 11：人參圖
（下津元知，《圖解本草》
卷 2，頁 4b。東京：國立
國會圖書館藏）



圖 12：人參圖
（寺島良安，《和漢三才
圖會》卷 92，頁 2b。東
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圖 13：人參圖
（平住專庵、楢村有稅
子，《唐土訓蒙圖彙》卷
11，頁 2a。東京：國立公
文書館藏）

⁵⁴ 真柳誠、友部和弘，〈中國醫籍渡來年代總目録（江戸期）〉，頁 151-183。

稻生若水熟讀各種中國本草，但也注意到了日本存在的多種人參偽品、代用品，除了明清中國常見的沙參、薺苳，日本還有防風、藁本、白芷、羌活、防葵等品類也常被當作人參使用。⁵⁵ 此外還有一些日本本土被稱作「人參」的植物，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薩摩所產之「小人參」，又名「三枝五葉」草。稻生若水評價道：「其苗葉、花、實雖與《圖經》三枝五葉之說相和，然根形迥異……此物絕非真人參。」⁵⁶ 此植物便是日本出名的「和人參」，因根部分節，又稱「竹節參」，現代植物學一般將其認定為 *Panax japonicus* (T.Nees) C.A.Mey.。據說這一品種由廣東潮州府澄海縣醫家何欽吉發現。何欽吉（?-1658）為躲避明末戰亂乘船出海，漂流至薩摩藩境內，被任用為侍醫，而他在薩摩境內發現的竹節參成為了十七、十八世紀日本主要的人參代用品種。⁵⁷

通過稻生若水的記錄可看出江戶日本人參代用品選擇的兩個思路：一是根部形態與人參相似，因此上述列舉的眾多傘形科、桔梗科植物成了市場中常出現的假人參，這與同時期中國的情況類似；二是植物形態符合中國本草書中的「三枝五葉」，和人參就是突出代表。不過和人參的問題在於根部橫生，這點與中國文獻的記載差異較大，因而為日本學者帶來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和人參究竟是與人參不同的植物，還是人參因日本地土不同而生成的不同形態？

享保改革是日本本草學家探索人參的轉折點。幕府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716-1745 年在位）繼位後，新井白石失勢，被迫隱退，但幕府所面對的財政危機和社會問題仍留待新任將軍解決。吉宗繼位後開啓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他推崇實學，放寬西洋書籍的禁令，重視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同時也通過來自中國的唐船蒐集清朝的各種實用訊息，醫藥知識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環。⁵⁸ 為解決進口藥材導致的白銀外流，吉宗開始推行藥材國產化計畫，人參的本土培育便是重中之

⁵⁵ 在江戶日本，一些人參代用品種的俗名往往含有「人參（にんじん）」，比如沙參稱「釣鐘人參（つりがねにんじん）」、杏葉沙參稱「丸葉人參（まるばのにんじん）」或「桔梗人參（ききやうにんじん）」、白川防風稱「山人參（やまにんじん）」、防葵稱「牡丹人參（ぼたんにんじん）」。參見飯沼愆齋，《新訂草木圖說》（明治七年刊本，劍橋：劍橋大學植物園圖書館藏），卷3，頁5a-6a, 8b-9a；卷5，頁10b-11a, 12b-13a。

⁵⁶ 稻生若水，《炮炙全書》（元祿五年刊本，京都：京都大學富士川文庫藏），卷1，頁1b。

⁵⁷ 瀨尾昭，《和人參の史的考察》，《日本東洋醫學會誌》27.4（1976）：193-198。

⁵⁸ 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參見辻達也，《享保改革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63）；關於享保改革對日本博物學的影響，參見 Marco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chapter 6。

重。他一方面命令設立於釜山的倭館蒐集朝鮮的藥材訊息，另一方面任用本草學家丹羽正伯（1691-1756）、野呂元丈（1694-1761）等人至全國各地進行物產調查。⁵⁹ 在這些實地考察實踐中，圖像便成為瞭解藥材最直觀的形式。

享保四年（1719），朝鮮通信使抵達日本，加藤謙齋（1669-1724）特意通過筆談向朝鮮醫官詢問人參品種問題，圖像是交流中的重要手段。相較於稻生若水對朝鮮使臣妄言的批評，加藤謙齋明顯更加信任對方的說法。⁶⁰ 面對竹節參的繪圖，朝鮮醫官表示：「我國不見如此者，或有之而不合藥用，故不採之者耶？」加藤謙齋繼續提問《證類本草》四圖中「何者近似貴國之參？」一位朝鮮醫官回答為滁州人參，另一位回答為滁州、兗州人參。⁶¹ 這似乎與中國醫家傾向於潞州人參的判斷大相逕庭，但觀察所附圖像即可發現，其中潞州人參圖將頂部花序改為類似沙參、桔梗的花序樣態，而根部繪製成臃腫、多分支的形狀（圖 14）。朝鮮醫官的論斷應主要依據圖繪中的根部，其中僅有滁州、兗州兩圖接近應有的紡錘形或「兩腳」形態。這種筆談形式在江戶時代日朝交往中非常普遍，也經常有醫官參與其中。⁶² 然而享保四年的醫事問答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幕府在兩年後開始了對朝鮮的藥材調查。⁶³

⁵⁹ 參見田代和生，《江戶時代朝鮮藥材調查の研究》，頁 183-218；安田健，《江戶諸國產物帳：丹羽正伯の人と仕事》（東京：晶文社，1987）；Sooyoung An, “The Japanese Survey of Materia Medica in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Studies of Na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56.2 (2024): 239-278。

⁶⁰ 稻生若水說：「朝鮮來人，言多謬妄，不可憑信。」（稻生若水，《炮炙全書》卷 1，頁 2a），加藤謙齋認為這是天和年間之事，此後來日的朝鮮人不再如此。

⁶¹ 加藤謙齋、加藤玄順，《和漢人參考》（延享五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頁 3b-5a。

⁶² 日朝醫學筆談相關研究，參見李敏，〈18 世紀日朝筆談的醫學史料研究〉（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文獻專業博士論文，2017）；陳明，〈筆談與明清東亞藥物知識的環流互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 3 期：81-95。

⁶³ 田代和生，《江戶時代朝鮮藥材調查の研究》，頁 82-90。



圖 14：竹節參與《證類本草》人參圖

(加藤謙齋、加藤玄順，《和漢人參考》，
頁 3b, 4b。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藥材調查期間，幕府醫官試圖通過多種渠道獲取人參的活植株或種子，以在御藥園進行本土培植。收集途徑有三種：首先，最為重要的途徑便是通過對馬藩與倭館從朝鮮獲取，最早有三株人參苗在享保六年（1721）送至江戶，直至享保十三年（1728）陸續有三十餘株人參植株及數十顆種子呈獻給幕府將軍。⁶⁴ 其次，通過長崎唐船的商人從中國獲取，最重要的是享保十一年（1726）南京俞枚吉帶來的活參三株、乾參三株和參子一包。⁶⁵ 最後，在全國藥材調查中，也有類似人參的植物被呈獻幕府，其中較為出名的有松本駝堂（1673-1751）於享保六年在紀州熊野山發現的直根人參。⁶⁶ 以上三種途徑皆有繪製人參圖呈獻幕府，雖然

⁶⁴ 田代和生，《江戸時代朝鮮藥材調査の研究》，頁 109-112。

⁶⁵ 丹羽正伯，《增補庶物類纂》（享保年間寫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2，頁 12b。

⁶⁶ 伴蒿蹊，《近世時人傳》（寛政二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5。正因「和人參」的根部橫生，所以直根參的發現受到格外重視，不過江戶後期有學者認為松本發現的並非真正的人參，見和田長純，《人參辨》（寛政六年寫本，東京：研醫會圖書館藏）。

原圖已不存，但可從當時曾親見繪圖的本草學家記述中略窺一二。南京俞枚吉除了帶來參苗和種子，還有自編〈人參譜〉一篇、人參圖一幅，從其對莖葉花實的詳細描述看，必屬五加科人參無疑。享保二十年（1735）又有清朝商人帶來一幅人參圖，但此圖所繪植物為蔓生，丹羽正伯又令長崎唐通事詢問此圖為何與本草書中的人參圖不符。⁶⁷ 由此可見，圖像是江戶本草學家鑑別人參的重要途徑。但這些圖像並未出版，因而流傳範圍不廣，僅有少數被幕府委任參與藥材調查的本草學家有機會見到。不過，幕府的藥材調查也激起眾多本草學家的興趣，人參譜錄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之後不斷出現。

人參譜錄除輯錄中日文獻記載之外，大多有對日本市場上人參品類及本土所生「人參」的記載，其中也繪有多種形態的人參圖像。人參圖像的增長一方面體現出享保改革中藥材調查對本草研究的影響，另一方面可看到圖像逐步成為江戶本草學知識建構的關鍵手段。雖然這一時期實地調查所得的圖像與知識逐漸增多，但並不意味著傳統中國本草書中的圖像被邊緣化，它們仍然是日本本草學家參照的重要對象。江戶時期出現了十餘種《紹興本草》的抄本，其中有數部僅含圖像（兩種為彩繪本），雖然目前《紹興本草》傳日的時間及途徑不詳，但如此多抄本的存在也體現出日本本草學對圖像的重視。經對比可發現，享保後日本人參圖譜中收錄的宋代人參圖皆轉繪自《紹興本草》。與《政和本草》、《大觀本草》相比，《紹興本草》人參圖的細節修飾較為明顯，其中最突出的是為「威勝軍人參」補充了塊根部分，這在前兩者中是不存在的（圖 15）。⁶⁸

⁶⁷ 丹羽正伯，《增補庶物類纂》卷 2，頁 18a-23a。

⁶⁸ 當然，因現存《紹興本草》皆為江戶時代的抄本，不知是原圖如此，還是日本畫師所做的修改。關於《紹興本草》的版本情況，參見中尾萬三，《紹興校訂本草解題》（京都：春陽堂，1933）；岡西為人，《本草概說》（大阪：創元社，1977），頁 114-117。



圖 15：《紹興本草》人參圖

（王繼先校訂，《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畫》
〔江戶寫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2）

「圖以詳其形狀，譜以正其真假。」這是江戶町醫服部範忠《人參譜》序言中的說法，也道出了江戶本草學家編譜繪圖的目的，即在繁雜的人參品種中辨識真偽。服部範忠在當時並不太出名，但他卻格外注重圖像在醫藥知識中的作用，在他存世的十餘部作品中，有《內景圖說》（1722 年刊本）、《藥圃圖纂》（1727 年寫本）、《人參譜》（1727 年寫本）、《菜魚圖贊》（1738 年寫本）四部作品配有大量插圖。在《藥圃圖纂》中，他拆解繪製各類藥材的葉、花、實形態，並做詳細解說，其中便有「五葉攢生一處」的人參五加葉（圖 16）。他對植物各部分的拆解意在「繪一花葉而使曉十花葉」，明顯帶有總結植物典型特徵的意味。⁶⁹

⁶⁹ 服部範忠，《藥圃圖纂》（寫本，享保十二年跋，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這與同時期西方博物學的發展相似，不知作者是否受到蘭學影響。



圖 16：人參葉

（服部範忠，《藥圃圖纂》。
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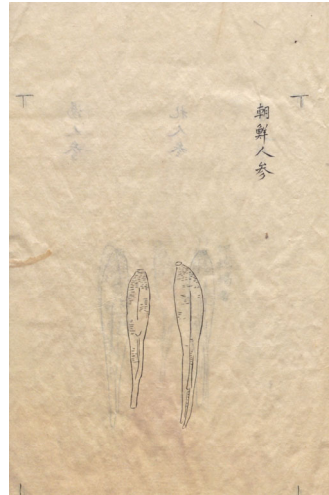


圖 17：朝鮮人參根部圖

（服部範忠，《人參譜》〔寫
本，享保十二年序，東京：國
立公文書館藏〕）

服部範忠《人參譜》有圖 28 頁，植株圖多為彩繪，而單獨的根部為墨線圖，開篇四幅圖便摹繪自《紹興本草》。接著，他又繪製了多種來自朝鮮、清朝和本土的人參商品圖，真偽品皆有，包括朝鮮人參、湯人參、扎人參、唐人參、碎人參等；然後是薺芎、桔梗、沙參這三種常見人參偽品的商品及植株形態；最後是日本本土常見人參代用品的植物全株圖像，包括蔓人參、零餘子人參、白芷、白山人參和防葵。最有趣的兩幅圖像出現在《紹興本草》圖與人參商品圖之間，其中一幅有著三桎五葉的地上植株形態和橫生的根部，根據後半部分的文本說明，此圖描繪的是日光山所產「人參」（圖 19）。他提到這是日本產「人參」中最接近朝鮮人參的品種，「可惜昔醫無人參橫生之說，風土異狀者乎？」他也將和人參橫生的形態歸結為風土的差異，仍將此種視為「本邦之靈草」。另一幅圖未標註名稱，但通過形態可推斷其為朝鮮人參圖。不過，此圖卻並非完全來自實地觀察，而是拼接的產物。服部範忠提到他曾在享保八年（1723）跟隨師傅橋商山在御藥園見到朝鮮人參。這對他而言顯然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他的觀察細緻，但記錄卻很可能出了差錯，他寫道：「三桎五葉，中心生一莖，苗長二尺

劉小藤

余，時秋結實如豆，大紅；其頂凹，少匾，莖頭七八枚攢生，一處葉有細刺，前圓後狹，每五葉攢生一處。」書中圖像明顯按照此繪製，其中「前圓後狹」的記載使他把人參葉片漸尖的前端繪成圓鈍形態，導致其朝鮮人參圖中的葉片有異於其他圖像。此外，他唯一一次觀察御藥園人參的機會卻並沒有見到根部，因此圖中的根部仿照同書中朝鮮人參的商品圖繪製（圖 17、18）。⁷⁰



圖 18：朝鮮人參
（服部範忠，《人參譜》）



圖 19：日光山人參
（服部範忠，《人參譜》）

幕府醫官將各種途徑得到的人參幼苗、種子在御藥園、日光山等處試種，十餘年後終於產出了足夠數量的種子向各地方分發種植。田村藍水在元文二年（1737）收到了二十顆人參種子，開始自己的種植實驗。田村藍水（1718-1776）大概是江戶時代最權威的人參研究者，他本姓坂上，名登，字玄臺，通稱元雄，早年曾跟隨幕府採藥使阿布將翁（?-1753）學習本草學。⁷¹ 在他開始試種朝鮮種人參前後也著手編纂《人參譜》，目的亦在釐清不同人參品種的真偽，他說：

⁷⁰ 服部範忠，《人參譜》。

⁷¹ 參見浦部哲郎，〈藥種の国産化：田村元雄の事績を中心に〉（東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2）。

「故盡圖書以發其賈，和漢凡七十有六種，分為五卷，辨以真、假、冒、俗。」⁷² 田村藍水的作品是十八世紀描繪日本「人參」種類最為豐富的書籍，且每種都以墨線圖描繪植株形象，並輔以簡短文字說明。他將「人參」分為四類，其中「真參」十六種，假參十二種，冒參五種，俗參三十七種。⁷³

田村藍水對人參的真偽標準比前人更為寬泛，上文提及的本草學家大多僅以中國和朝鮮所產人參為真品。但田村藍水的「真參」包括遼東參、紫團參、百濟參、新羅參、《紹興本草》所繪四種人參、七種日本本土出產的「人參」以及御藥園人參。絕大部分日本本土的人參代用品種被他歸為「俗參」，即民間所用的人參；僅有沙參、丹參等少數種類為「假」、「冒」之參。仔細檢視十六種「真參」，前八種圖像僅有遼東參是「寫某家所藏圖」，但描繪的是參鬚（圖 20 ①）。⁷⁴ 紫團參、百濟參、新羅參都來自中國本草書籍的記載，但並無圖像可供參考，其莖葉花皆為三桠五葉的形態，這是他在御藥園人參（圖 20 ④）中可觀察到的，而根部則大概是根據文字記載進行的想像，比如百濟參俗名羊角參，繪圖中的根部仿照羊角形態繪為單股無分支的樣子，新羅參有「根如人形者神」的記載，因而根部繪製為「兩臂兩腳」的人形（圖 20 ②③）。而日本本土所產「真參」則根部、花序形態各異，但僅有一點是相同的，那便是葉片形態與御藥園人參相似，僅有二桠、三桠或四桠之別（圖 21）。這說明田村藍水的判斷標準仍然遵循中國本草書的記載，其中「三桠五葉」是標準形態，但在不同生長階段會有二桠、四桠的區分。

⁷² 田村藍水，《人參譜》，〈自序〉。

⁷³ 如以目錄所列條目統計，總數僅有七十種，與序言所記不符；但部分頁面繪有兩株植物，如以繪製的植株數統計，正合序言之七十六種。

⁷⁴ 根據中國清代的人參譜錄及日本長崎貿易文獻記載，當時出口到日本的人參大多為質量較低的參條、參鬚。

劉小朦



①遼東參

②百濟參

③新羅參

④御藥園人參

圖 20：各類人參圖

（田村藍水，《人參譜》〔寫本，元文二年序，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1）



①竹節參

②豆州人參

③江州人參

④和州人參

圖 21：「真參」中的日本本土品種

（田村藍水，《人參譜》卷 1）

不過，上述兩部《人參譜》皆為寫本，流傳範圍有限。寶曆七年（1757），田村藍水在江戶湯島舉辦藥草會，召集本草同好，展出各類珍奇藥品。連續舉辦數年後，影響力漸廣，展品從最初百種增至上千種。弟子平賀源內（1728-1780）在協助舉辦藥草會的同時，亦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藥品繪圖並加以文字介紹，編成

《物類品騭》一書，於寶曆十三年（1763）出版。平賀源內早年在長崎遊學，除對本草學格外有興趣，亦曾學習西洋繪畫技巧，因而其藥品繪圖明顯帶有西洋博物圖的特徵。田村藍水《人參譜》繪圖整體風格仍受中國傳統本草圖影響較多，以墨線勾勒植物大致形態，且多繪製植物全株，不會為刻意突出某部分而調整比例。平賀源內的圖像則描繪了更多細節，線條形式多變，更具東亞傳統工筆繪畫風格。不過，他並不追求繪製完整植株，反而刻意強調重點部分：比如將莖和根分為兩部分，通過放大比例強調重要部位，這是西洋植物繪圖的特點。同時，他也將時間性引入繪圖，這在人參圖中尤為突出。他將人參生長過程分四幅圖繪出初生的一桎三葉、兩桎五葉、三桎五葉以及結實的四桎五葉形態；每個階段根與莖皆分別描繪，並在結實圖中突出表現果實及莖部分桎處（圖 22）。⁷⁵

這種分階段的畫法亦受中國本草知識的影響，早在宋代官修本草中便有人參從初生一桎到二、三、四桎的記載，在江戶日本的人參文獻中，對人參不同生長階段的觀察記錄也非常多見，但這些文字記載卻從未被呈現於圖像之中。在《物類品騭》出版同年，田村藍水被任命為幕府醫官。此時幕府引種人參的計畫已基本成功，接下來進入大規模種植和商業化階段，田村藍水成為專門負責人。他在明和元年（1764）出版《朝鮮人參耕作記》，其中所附圖像雖與前者略有差異，但亦以不同的桎、葉數量來描繪人參的生長階段。⁷⁶ 由於田村藍水與平賀源內在江戶本草學界的影響力，日本人參圖像的繪製模式基本定型。這種模式下的人參圖像不僅多出了生長階段的描繪，且將重點放在桎葉而非根部的細節描繪，相較於花序更重視果實。對於江戶本草學家而言，他們已通過市場中的人參瞭解到根部的形態，因而在追求「真人參」的過程中，三桎五葉的植物形態便成為最為關鍵的要素。而對於根部的表現，早期的人參圖譜中多繪製各種不同來源的商品形態，但相較於中國明清時期的人參圖，日本人參圖缺少對蘆頭部分的細節描繪，蘆頭是中國人參鑑別知識中判斷參齡、辨識品質的重要特徵，卻在日本的人參知識中居於次要地位。到十八世紀中期後的出版品中，根部基本被描繪為單股、無大支根、帶有鬚根的細長紡錘形態。十九世紀初期，岩崎灌園（1786-1842）的《本草圖譜》繪製了江戶末期最為精美的人參圖像，但基本模式仍未改變。⁷⁷

⁷⁵ 平賀源內，《物類品騭》（寶曆十三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卷 5，頁 1b-4a。

⁷⁶ 田村藍水，《朝鮮人參耕作記》（明和元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頁 2b-3b。

⁷⁷ 岩崎灌園，《本草圖譜》（文政十三年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卷 5，頁 4b-6a。



圖 22：人參生長階段圖

（平賀源內，《物類品隲》卷 5，頁 1b-4a。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Ninjin 與 Ginseng：近世歐洲的人參圖

自十七世紀起，許多到過東方的歐洲傳教士或旅行家開始在作品中描述人參，不過記載較為簡略，多注重人參的藥用價值而非植物特徵。⁷⁸ 十七世紀初荷蘭人較早從日本將人參帶回歐洲，英荷的商貿與殖民網絡逐漸成為歐洲人獲取人參最重要的渠道。荷蘭博物學家阿爾貝圖斯·塞巴（Albertus Seba, 1665-1736）的收藏裡，便有多種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公開拍賣中購得的人參。⁷⁹ 英國皇家學會的漢斯·斯隆（Hans Sloane, 1660-1753）也是一名人參的狂熱收藏家，他的人參標本收藏也得益於前往東亞的商人與博物學家。⁸⁰ 不過，這些身處歐洲的學者在十七世紀前半葉僅能通過荷蘭人運來的商品、傳教士的遊記以及介紹中國歷史與地理知識的作品中瞭解到人參的片段訊息，他們對人參有著多種不同的稱呼，Ginseng 雖然是最常見的名稱，但 Gensing、Gin-sen、Gin-sem 等不同的拼寫方式依然存在。此外，由於荷蘭人帶回來自日本的訊息，人參的日語讀音 ninjin、ninsin、ninsing、nindsin（現今標準羅馬化注音為 ninjin）及其變體 nisi 也是歐洲人常用的詞彙。歐洲學者得知人參的名字來源於它類似人體的外形，這很容易讓他們把人參與歐洲中世紀本草書中的人形藥草曼德拉草（mandragora）進行對照。這種人形神草的想像也存在於歐洲人早期對人參的圖像呈現之中。耶穌會傳教士蓋伊·塔查爾（Guy Tachard, 1651-1712）於 1685 年跟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往暹羅的使團遊歷東南亞，回國後出版遊記，詳細描述他的旅途見聞及當地的風俗與動植物。書中附有一幅植物插圖，同時繪製茶樹、棕櫚、檳榔和人參，其中人參似乎在地上跑動。⁸¹ 塔查爾顯然沒有見過人參的原植物，只見到作為商品和藥品的根部，圖中所繪的具備人形的「土精」形象顯然來自於傳聞與想像（圖 23）。

⁷⁸ 高晞，〈十五世紀以來中醫在西方的傳播與研究〉，《中醫藥文化》2015 年 6 期：15-24。

⁷⁹ Louis de Jaucourt, "Ginseng," in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7 (Paris: Briasson, Bavid l'aîné, Le Breton, Durand, 1757), pp. 664-667.

⁸⁰ John H. Appleby, "Ginseng and the Royal Society,"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37.2 (1983): 121-145; Heasim Sul, "Ginseng Exhibit of the British Museu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btaining Route and Responses of the Contemporaries," *Journal of Ginseng Culture* 3 (2021): 38-53.

⁸¹ Guy Tachard, *Voyage de Siam, des Peres Jesuites, Envoyez par le Roy aux Indes & à la Chine: avec Leurs 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et Leurs Remarques de Physique, de Géographie, d'Hydrographie, & d'Histoire* (Paris: Chez [brace] Arnould Seneuze, ruë de la Harpe, à la Sphere et Daniel Horthemels, ruë de la Harpe, au Mécenais, M. DC., 1686), pp. 372-373.



圖 23：塔查爾植物圖

(Tachard, *Voyage de Siam*, p. 372.
Courtesy of the Boston College Libraries)



圖 24：皮索人參圖

(Guilielmi Pisonis, *De Indiae Utriusque re Naturali Et Medica* [Amstelaedami: Apud Ludovicum et Danielem, 1658], p. 194.
Courtesy of the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

一・從 VOC 到勃蘭登堡：歐亞博物學網絡與人參圖搜集

隨著歐洲博物學家對探索世界各地動植物的興趣，人參這種來自中國的神藥也激起學者的好奇心。在人參植物標本難以獲得的情況下，圖像成為歐洲學者瞭解人參最重要的途徑。筆者所見最早出現在歐洲的人參植物圖出自於荷蘭博物學家威廉·皮索（Willem Piso, 1611-1678）在 1658 年出版的《東西印度自然與醫學志》（*De Indiae Utriusque re Naturali Et Medica*），該書包含了皮索早先出版的《巴西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 Brasiliae*）、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雅各布·德·邦德（Jacob de Bondt, 1592-1631）的《東印度群島自然與醫學志》（*Historiae Naturalis et Medicae Indiae Orientalis*）、以及皮索編輯的《香料補遺》

(*Mantissa Aromatica*)。⁸² 書中最後一部分記錄有一種名為 *ninzin* 的植物，根據名稱便可判斷是人參的日語音譯。皮索從未涉足東亞，關於人參的紀錄應來自 VOC 帶回的商品及訊息，其中的插圖是在 Fr. de Vicq 的協助下製作而成。⁸³ 但檢視文中所配插圖，卻與五加科人參形態差異甚大（圖 24）。他說：「（人參）葉子的形狀多種多樣，與我們種植的歐防風（*Pastinaca*）類似。」⁸⁴ 雖不知此圖所據的具體植物種類，但很可能是當時日本民間的人參代用品種之一。它作為在歐洲公開出版物中出現的第一幅完整的人參圖，也受到了學者的重視，常常被相關研究徵引。⁸⁵

1686 年，一位署名為 L. 施羅克（L. Schröck）的作者在德國著名博物學雜誌《珍奇雜錄》（*Miscellanea Curiosa*）第四期發表一系列來自巴達維亞的安德雷亞斯·克萊耶（Andreas Cleyer）的書信，其中有各類亞洲植物的描述，包括人參（*Radice Gensingh*）。⁸⁶ 但這篇文章的發表引起另一位知名學者克里斯蒂安·門澤爾（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的危機感。他隨即在同一年第五期發表了關於人參的專論，開篇便提到自己對人參的興趣由來已久，且與克萊耶一直保持通信往來。施羅克搶先發表克萊耶書信讓他稍顯尷尬，不得不作出回應。他解釋道：「（我的研究）計畫由於一位非常博學的先生而擱置數年，他曾經安排將有關這種根的典型中文文本及相關圖像雕版印行，但直到今天他的工作依然未能完成。出於對他的尊重，我不願過早涉足。」⁸⁷ 為了避免重複，他選擇發表新近收

⁸² 其中邦德的作品最早於 1642 年出版，關於其生平及貢獻參見 Harold J. Cook, "Global Economies and Local Knowledge in the East Indies: Jacobus Bontius Learns the Facts of Nature," in *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d. Londa Schiebinger and Claudia Sw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pp. 100-118。Jacobus Bontius 是邦德姓名的拉丁文形式。雖然《香料補遺》署名為皮索，但其中包含諸多來自東印度群島的植物。皮索本人從未親至東印度群島考察，故而有學者認為該作品為皮索根據其他博物學家（包括邦德）搜集的訊息編輯而成。因此，當時也有部分博物學家將該書中的 *ninzin* 條目視為邦德的記錄，不過其中的插圖更可能為 1658 年出版時所繪製。

⁸³ 此處所指很可能是當時阿姆斯特丹的著名醫師 François de Vicq（1603-1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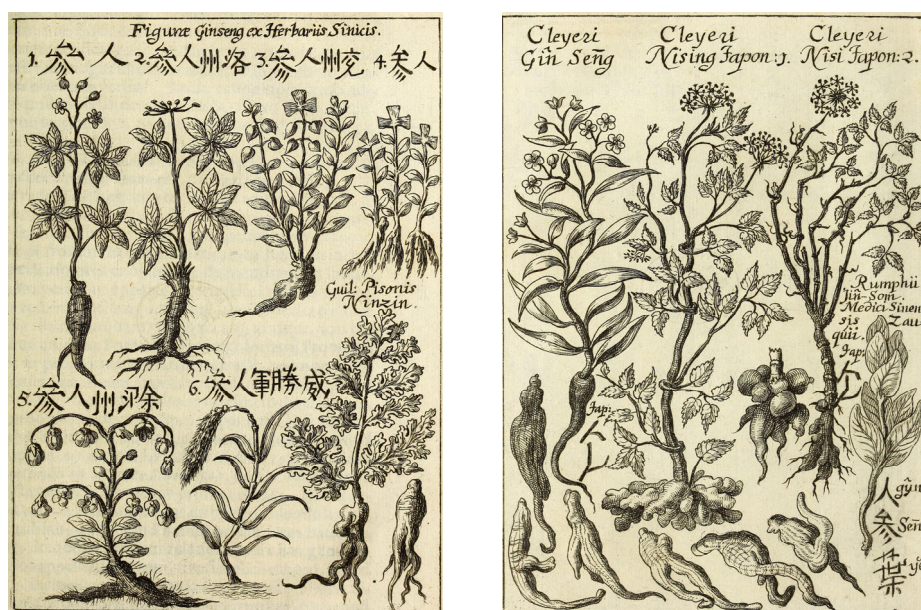
⁸⁴ Pisonis, *De Indiae Utriusque re Naturali Et Medica*, p. 194.

⁸⁵ 當時文獻常用其姓名的拉丁文屬格形式 Guilielmi Pisonis 或簡寫 Guil. Pisonis。

⁸⁶ Andreae Cleyeri, "De Radice Gensingh," *Miscellanea Curiosa, sive Ephemeridum Medico-Physicarum Germanicarum Academiae Naturae Curiosorum* 4 (1685-1686): 3-6.

⁸⁷ Christiani Mentzelii, "De Radice Chinensium Gin-Sen," *Miscellanea Curiosa, sive Ephemeridum Medico-Physicarum Germanicarum Academiae Naturae Curiosorum* 5 (1686-1687): 73.

到的郎弗安斯（Georg Everhard Rumphius, 1627-1702）關於人參的書信。郎弗安斯是 VOC 的成員，長期生活在東南亞的安汶島，對當地動植物有著精深的研究，被時人稱為「安汶島的普林尼」。⁸⁸ 門澤爾另附了兩幅圖版，其中包括 10 種人參植株、8 種人參根部和 1 種人參葉的圖像（圖 25）。⁸⁹



①

②

圖 25：門澤爾人參圖

(Mentzelii, "De Radice Chinensium Gin-Sen," pp.73-74.

Courtesy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ibrary, London)

⁸⁸ 關於郎弗安斯在安汶島的經歷和博物學研究參見 Genie Yoo, "Wars and Wonders: The Inter-Isl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of Georg Everhard Rumphiu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51.4 (2018): 555-584。

⁸⁹ 門澤爾另有一部關於人參的手稿保存於波蘭雅蓋隆大學，編號 Ms. Sin. 18，題為 *Ausführlicher Bericht von der Wurtzel GIN-SEN: Auß den Chineesischen Texten, Gelährter Männer Gezeugnüssen, und Selbst Eigener Erfahrung*，可直譯為《關於人參的詳細報告：來自中文文本、博學者的證言以及個人經驗》，其中所附三張圖與 *Miscellanea Curiosa* 發表文章的附圖完全一致，應來自同一印版。門澤爾很可能曾計劃將關於人參的研究單獨出版。

從 1658 年皮索著作出版算起，三十年後門澤爾突然發表了十餘幅人參圖，它們來源於何處呢？門澤爾提到其中六種根部圖像繪自他所收藏的人參標本（圖 25 ②左下部分），其他的數種植株也分別用拉丁文標出了訊息來源，分別是 Cleyeri, Rumphii, Pisonis，即前文提及的克萊耶、郎弗安斯和皮索。另一幅圖版編號 1-6 的人參植物圖皆標註有中文名稱，並說明來源於中國本草書（圖 25 ①）。如對十七世紀中國本草插圖有所瞭解，很容易便可確定出處：1 是《本草綱目》人參圖的轉繪；2、3、5、6 來自宋代官修本草中的四幅人參圖；而 4 則出自一部不太出名的本草書，即前文提到的《鼎雕徽郡原板合併大觀本草炮製》（下文簡稱《本草炮製》）。不過，這些中國本草書在十七世紀末已經傳到歐洲了嗎？門澤爾有可能參考這些書嗎？

門澤爾是當時歐洲著名的漢學家，他曾任勃蘭登堡選帝侯兼普魯士公爵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 1620-1688）的私人醫生。腓特烈對東方語言文化頗有興趣，他收藏有諸多漢籍，而門澤爾便曾受命管理其藏書，也借此機會接觸諸多漢文原典，並編輯過一部重要的拉丁—漢語詞典《字彙》。腓特烈的藏書現分別保存於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和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Biblioteka Jagiellońska），其中便藏有一部金陵本《本草綱目》、一部和刻本《江西本草綱目》（1637 年刊）和一部《本草炮製》。⁹⁰ 因此，圖 25① 中 1、4 兩圖的來源便十分清晰。有趣的是，該館藏《本草炮製》記載有人參的一頁現已缺失；另有一部原屬門澤爾的手稿，其中有《本草炮製》的抄錄，繪有人參圖的一頁同樣缺失。⁹¹ 另一位德國漢學家穆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在 1674 年出版的作品中附錄了一幅與 4 號非常相似的人參圖，他聲稱此圖來源於勃蘭登堡選帝侯的藏書。⁹² 由此可推斷《本草炮製》中有關人參的一頁曾被多位德國學者抽出檢視，乃至最終丟失，當時歐洲漢學家與植物學家對人參的強烈興趣可見一斑。那宋代官修本草中的四幅人參圖從何而來？柏林國家圖書館現藏一部《大觀本草綱目全書》，但該坊刻本校訂並不仔細，書

⁹⁰ 後者現存極少，筆者所見僅有柏林國家圖書館和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有收藏。

⁹¹ 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Ms. Sin. 10。

⁹² Andreas Müller, *Hebdomas Observationum De Rebus Sinicis* (Coloniae Brandenburgicae: Schultzius, 1674), pp. 34-35. 作者在文末提到自己有意將讀到的有關人參的中文文本及圖像單獨出版，不過他後續並沒有出版任何相關的作品。穆勒亦曾為勃蘭登堡選帝侯管理藏書，他很可能就是門澤爾提到的那位「非常博學的先生」。

中「潞州人參」訛為「洛州人參」（圖 26 ①）。⁹³ 這一文字錯誤不僅出現於門澤爾發表的版刻圖像中，在其手繪人參圖中亦有體現，不過在對應文字上方有後續的更正（圖 26 ②）；細觀手繪圖像，多種細節皆與圖 26 ①中的圖像相同。由此可證，《大觀本草綱目全書》即為門澤爾繪製人參圖時重要的參考文本之一。⁹⁴

門澤爾的另一張圖版（圖 25 ②）包括三種完整的人參植株，全部來自克萊耶，另有右下角的人參葉繪圖來源於郎弗安斯。通過圖中所注的 Japon 以及日文可知其來源於日本，從繪圖風格來看它們並非轉繪自日本書籍的插圖，而是歐洲製圖師根據原植物的觀察而做。這也指明十七世紀末歐洲人參知識的重要來源：荷蘭東印度公司（VOC）。自十七世紀中葉起，荷蘭成為唯一可與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通商的歐洲國家。諸多歐洲——尤其是來自荷蘭、德國——的醫師、博物學家得以通過 VOC 抵達長崎，並對日本的動植物進行調查。⁹⁵ 克萊耶在巴達維亞聲名卓著，他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分加入 VOC，並依靠自身的醫學知識先後擔任 VOC 軍事醫院藥房和巴達維亞城市藥房主管，他迅速擴展自己的人脈和影響力，成為當時巴達維亞最具權勢的醫師。他在 1682-1683 和 1685-1686 年兩次以荷蘭商館長的身分前往長崎出島，並在助手的協助下蒐集當地的植物訊息。他長期保持與德國博物學社群的聯繫，寄回歐洲的書信多次被發表在 *Miscellanea*

⁹³ 唐慎微，《大觀本草綱目全書》（明萬曆六年歸仁齋刊本，柏林：柏林國家圖書館藏），卷 6，頁 12a。該書雖號稱「大觀本草」，但題名頁標註「謹依山東原板圖經證治」，亦保留有原版中的成化四年（1468）序言。其中所謂的「山東原板」並非《大觀本草》，而是翻刻自晦明軒本的《政和本草》。見岡西為人，《本草概說》，頁 146。柏林國家圖書館藏本在圖中註有「ginsen」字樣，與門澤爾對人參二字的拼寫相同，應為其查閱此書時所做批注。（見圖 26）

⁹⁴ 門澤爾的手繪人參圖見於一份厚達 300 餘頁的手稿，現藏波蘭雅蓋隆大學圖書館，編號 Ms. Sin. 15。其中絕大部分為空白，僅有四頁有少許文字和圖像。有學者認為它原屬波蘭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Michael Boym）所有，詳見 Edward Kajdański, “Michael Boym’s *Medicus Sinicus*: New Facts, Reflections, Conclusions,” *T’oung Pao* 103.4/5 (2017): 448-472。手稿首頁文字寫有「江西本草綱目」字樣，應抄錄自同一批藏書中一部和刻本的《本草綱目》（編號 Libri sin. 102/107），其餘三頁分別繪製了三種本草圖像：人參、露蜂房和龜，但其中所繪人參插圖並非出自《本草綱目》。經與門澤爾其他手稿進行筆跡對照，有頗多相似之處，此手稿的原作者更可能為門澤爾而非卜彌格。

⁹⁵ 古賀十二郎，《長崎洋學史》（長崎：長崎文獻社，1966）。

Curiosa 期刊。⁹⁶ 克萊耶一直與門澤爾保持書信往來，他首次前往長崎蒐集到的一批植物繪圖便寄給了門澤爾。⁹⁷



圖 26：門澤爾人參圖的文本來源與手繪圖像

(Libri sin. 64/65, <http://resolver.staatsbibliothek-berlin.de/SBB000160D300010000>;

Ms. sin. 15, <http://resolver.staatsbibliothek-berlin.de/SBB00021BB000000000>).

Courtesy of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K)

克萊耶寄給門澤爾的三幅人參圖明顯是不同品種，以當今的植物學觀點看，它們都並非五加科人參，第一種具備石竹科特徵，後兩種則是傘形科植物。對比後兩者，雖然植物形態有一定差異，但有些關鍵特徵十分相似，兩者都有分支眾多的塊根、葉片都是三個一組、皆為傘狀花序（兩者繪製角度有差異，前者為側面視角，後者為俯視視角），因此後兩者有可能是同一種植物或相似的品種。而

⁹⁶ Wolfgang Michel, “Ein Ostindianisches Sendschreiben: Andreas Cleyers Brief an Sebastian Scheffer vom 20. Dezember 1683,” 《独仏文學研究》41（1991）：15-98。克萊耶在巴達維亞與出島的事跡，參見 Harold J. Cook,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 8 & 9。

⁹⁷ Andreas Cleyer and Christian Mentzel, *Flora Japonica* (manuscript kept at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Libri picturati 41/42).

根據郎弗安斯的書信，他關於人參的訊息來自一名中國人，他聲稱歐洲人 Ginseng 的讀音是有問題的，當地的中國人都讀作 Jinzem 或簡稱 Som。⁹⁸ 這應是人參的粵語或閩南語讀音，郎弗安斯接觸到的很可能是在南洋經商或定居的廣東或福建人，他們在當時也不太可能獲得真正遼東人參的植株，提供的人參葉片明顯並非出自五加科植物。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VOC 建立的商業與訊息搜集網絡成為歐洲人參圖像與知識的重要來源。但圖像並未能幫助門澤爾釐清人參品種，反而更增疑惑，不僅中國文本中的人參圖描繪多種不同的植物，克萊耶實地蒐集的植物圖也不盡相同。無獨有偶，施羅克也注意到前人出版物中對人參的記載與克萊耶的描述有所差異。克萊耶自身也對獲得的不同人參標本深感疑惑，他在書信中稱自己曾有另一種人參標本，整體類似風鈴草（*Rapunculo*），長有藍色的花。⁹⁹ 如對中日人參歷史有所瞭解便不會奇怪，與風鈴草同屬桔梗科的沙參、桔梗是近世中日市場中常見的人參偽品或代用品。然而不能就此推測克萊耶受到日本人的誤導，蒐集的植物皆為「假人參」。通過上節的論述可知，十七世紀末日本本土並不出產五加科人參，當時日本人稱作「人參」的植物種類繁多。但克萊耶所得的兩種植物圖並非隨機蒐集，同時期歐洲另有幾種不同來源的人參圖，它們都與克萊耶的圖像具有很高的相似性。這又印證了日本近世人參史上的另一個問題：雖然十七世紀末日本存在多種被當作「人參」的植物，但有兩種是最為常見，也是他們在向歐洲人介紹人參時最常提供的標本。

二・薩摩人參與零餘子人參：歐洲人參圖中的兩種植物

尼希米亞·格魯（Nehemiah Grew, 1641-1712）在 1681 年為英國皇家學會編製的動物、植物與礦物收藏目錄中提到一件人參（ninzin）根部標本，並明確提出其形態與皮索的圖像不符。¹⁰⁰ 他還記錄一幅名為 ninsin 的植物彩繪，其根部形態與前述標本一致。不過根據文字描述，它明顯並非現今熟悉的五加科人參：「莖與小麥桿一樣粗，一英尺高；葉片與紫羅蘭有些類似；花苞帶一點紅色，開

⁹⁸ Mentzelii, "De Radice Chinensium Gin-Sen," p. 76.

⁹⁹ Clever, "De Radice Gensingh," p. 4.

¹⁰⁰ Nehemiah Grew, *Musaeum Regalis Societatis, or, A Catalogue &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arities Belonging to the Royal Society and Preserved at Gresham Colledge* (London: Printed by W. Rawlins, 1681), p. 227.

花呈白色，三個一組。」¹⁰¹ 雖未能找到原圖，但作者提供的描述與克萊耶人參圖的第一種十分類似，另一位著名英國植物學家也繪有一幅在當時被廣泛引用的人參圖。倫納德·普拉肯內特（Leonard Plukenet, 1642-1706）雖非皇家學會會員，但他憑藉自己的專業知識在英國植物學社群內享有良好的聲譽，並曾擔任女王瑪麗二世的皇家園藝師。他從 1691 年開始陸續出版了多部植物圖冊，第二卷便收錄一張人參圖，除了多分枝的根部，該圖與克萊耶的圖像有多處相似，尤其對花序的描繪如出一轍（圖 27）。他在文字說明中表示該圖與克萊耶的人參圖類似，卻與邦德的圖像差異極大。該圖的根部與地上部分有著不同的來源，根部由一位朋友提供，而枝葉的圖片則來自於皇家醫師學會的唐克雷德·羅賓遜（Tancred Robinson, 1658-1748）。¹⁰² 有學者認為羅賓遜所擁有的人參圖可能正是格魯目錄裡記錄的 *ninsin* 圖，通過普拉肯內特的圖像便可大致推測皇家學會所藏人參圖中枝葉的樣貌。¹⁰³

郎弗安斯的《安汶本草志》（*Het Amboinsche Kruidboek*）中也有極為相似的圖像。考慮到他與克萊耶同屬 VOC 成員，兩人可能有過訊息分享，或者二人有相同的訊息來源。雖然包含人參圖的《安汶本草志·增補卷》直到 1755 年方才出版，但該書手稿在十七世紀末已經完成，人參圖已收入其中。¹⁰⁴ 出版品對原稿做了細節上的改動（葉片數量、根部紋路、開花狀態），刪去兩幅來源於中國本草書的插圖；另於右側新增一幅人參根部圖像，經比對應來自門澤爾轉繪的皮索人參圖（圖 28、29）。普魯士植物學家約翰·佈雷內（Johann Philipp Breyne, 1680-

¹⁰¹ Grew, *Musaeum Regalis Societatis*, p. 376.

¹⁰² Leonardi Plukenetii, *Phytographia seu Stirpium Eikones Fideliter & Exquisite ad Vivum Delineatae Aenisque Tabulis Illustratae in Quibus Novae Plures & Exoticae Plantae a Nemine Hactenus Animadversae Nunc Primum Proponuntur; necnon Aliae Quaedam apud Neotericos Dubiae Atque Obscurae (mutatis aliquando nominibus prout res ipsa postulat) Perspicua Brevitate Dilucidantur. Pars altera [2]* (Londini: Sumptibus Autoris, 1691), Tab CI, Fig 7. 所謂「邦德的圖像」即上文所引皮索人參圖，詳見註釋 82。

¹⁰³ Appleby, "Ginseng and the Royal Society," p. 124.

¹⁰⁴ 印本見 Georgius Everhardus Rumphius, *Het Auctuarium, ofte Vermeerdering, op het Amboinsch Kruid-boek* (Te Amsterdam: by Mynard Uytwerf, en de wed. S. Schouten en Zoon, 1755), Tab xxi, fig1；手稿見 Georgius Everhardus Rumphius, *Amboinsch Kruidboek, boeken I-XII, met het Auctuarium of Toegift*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BPL 314. Late 17th century), part 13, f. 72a*r-72b*r。手稿現存萊頓大學圖書館，已被電子化，網址為 <http://hdl.handle.net/1887.1/item:3440176>，讀取 2025.02.11。

劉小朦

1764) 在其 1700 年的人參專論中也附有類似的人參植物圖。¹⁰⁵ 德國博物學家瓦倫蒂尼 (Michael Bernhard Valentini, 1657-1729) 作品中亦附有兩種人參圖，它們明顯轉繪自佈雷內與普拉肯內特所繪製的圖像。¹⁰⁶



圖 27：

普拉肯內特人參圖

(Plukenetii, *Phytographia...*
Pars altera, Tab CI, Fig 7.

Courtesy of Biblioteca
Digital del Real Jardín
Botánico de Madrid)



圖 28：

郎弗安斯手稿中的人參圖

(Rumphius, *Amboinsch*
Kruidboek, part 13, f. 72b*r.

Courtesy of the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圖 29：

《安汶本草志》人參圖

(Rumphius, *Het Auctuarium,*
ofte Vermeerdering, op het
Amboinsch Kruid-boek, Tab
xxi, fig1. Courtesy of the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¹⁰⁵ Johannes Philippus Breynius, *Dissertatio Botanico-Medica de Radice Gin-Sem, seu Nisi et Chrysanthemo Bidente Zeylanico Acemella Dicto* (Lugduni Batavorum: apud Abrahamum Elzevier Academiae Typographum, 1700).

¹⁰⁶ 佈雷內與瓦倫蒂尼作品中的人參圖已收錄入沃夫岡·米歇爾的最新研究中，本文不再贅述。參見沃夫岡·米歇爾，〈歐洲人與人參 (1600-1740)〉，頁 110-111。

在日本，田村藍水《人參譜》中有一幅相似的圖像，名為「薩州人參」（圖30）。他記錄稱：「正名女萎菜，今往往俚人呼稱薩摩人參，二月生苗，其形似剪春羅，大至七八月莖端有花，秋後結實，其形殆類王不留行，子根樣似防風。」¹⁰⁷《廣參品》中有「サツマ人參」（即薩摩人參），對其形態描述與前者基本一致，文中提到這種植物是「《救荒本草》所載女萎菜」。¹⁰⁸《救荒本草》原文作「女萎菜」，植物插圖與上述歐洲人參圖一致，但未繪製根部形態（圖31），現代植物學鑑定為石竹科植物 *Silene firma* Sieb. & Zucc.。¹⁰⁹ 在近世日本，它也是藥材王不留行的基原植物之一。¹¹⁰ 岩崎灌園在《本草圖譜》中便將其列入「王不留行」條下，並記錄說「此根頗似人參」。¹¹¹ 由此可見，*Silene firma* Sieb. & Zucc. 即為上述荷蘭、英國學者筆下描繪的「人參」。

¹⁰⁷ 田村藍水，《人參譜》卷4。

¹⁰⁸ 松岡玄達，《廣參品》（寶曆十一年刊本，東京：東京大學圖書館藏），頁13a。

¹⁰⁹ 朱橚，《救荒本草》（明萬曆十四年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卷1，頁72a；朱橚著，王錦秀、湯彥承譯注，《救荒本草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31。

¹¹⁰ 在日本江戶時代對朝鮮的藥材調查記錄《藥材質正紀事》中，「王不留行」的繪圖與女萎菜極為相似。參見田代和生，《江戶時代朝鮮藥材調査の研究》，圖錄頁26。王錦秀將《救荒本草》中的「王不留行」圖鑑別為 *Silene firma* Sieb. & Zucc. 的同屬植物 *Silene aprica* Turcz. ex Fisch. & C.A.Mey.，見朱橚，《救荒本草譯注》，頁220-221。

¹¹¹ 岩崎灌園，《本草圖譜》卷18，頁20b。該書在「野胡蘿蔔」條下也列舉了幾個不同的植物品種，其中亦有さつまにんじん（薩摩人參／女萎菜）（卷47，頁8b）。



圖 30：薩州人參

(田村藍水，《人參譜》卷4)



圖 31：女婁菜

(朱橚，《救荒本草》卷上，頁72a。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相較於上述人參圖在歐洲博物學者間的廣泛流傳，克萊耶的另外兩種人參圖最初並沒有受到過多重視，少有學者提及，畢竟其根部形態與歐洲人當時所見的商品人參差異較大。然而到 1712 年，一位曾在日本遊歷的博物學家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品，其中的人參圖與克萊耶另外兩種人參圖更為相似。德國植物學家剛伯法（Engelbert Kämpfer, 1651-1716）曾隨瑞典使團訪問波斯，後加入 VOC，1690 年以醫師身分到達長崎出島並停留兩年，期間兩次隨使團前往江戶。在日本期間他詳細調查各類日本植物，人參自然也在考察之列。回國後，他於 1712 年出版《異域奇觀》（*Amoenitatum Exoticarum*）一書，介紹他在亞洲的各類見聞，最後一部分是對日本植物的介紹。他不僅記錄人參的多種稱呼，還提供在當時最為詳細的人參圖和植物學描述。¹¹²

¹¹² Engelbert Kaempfer, *Amoenitatum Exoticarum Politico-Physico-Medicarum Fasciculi V: Quibus Continentur Variæ Relationes, Observationes & Descriptiones Rerum Persicarum & Ulterioris Asiae: Multâ Attentione in Peregrinationibus per Universum Orientem Collectae* (Lemgoviae, Typis & impensis Henrici Wilhelmi Meyeri, aulæ Lippiacæ typographi, 1712), pp. 818-821. 關於剛伯法在日本的植物學調查，可參考 Wolfgang Michel, “On the Background of Engelbert Kaempfer’s Studies of Japanese Herbs and Drugs,” 《日本醫史學雜誌》48.4 (2002) : 692-720。

這幅插圖將所繪植物的生長過程分為三個階段，最右側是其成熟形態，此圖與克萊耶的後兩幅人參圖所繪植物有著許多相似特徵：分枝眾多而攢成一團的塊根、分節的枝幹、相似的葉片分布結構、帶有鋸齒狀的葉片邊緣、傘狀花序（圖 32 ①）。二人所見大概為同一種植物，近世日本的人參代用品中傘形科植物眾多，依靠圖像和文獻難以做出準確判斷。幸運的是，剛伯法的收藏後被英國皇家學會的漢斯·斯隆購得，現在文本檔案、圖像及標本分別保存在大英圖書館、大英博物館與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¹¹³ 在原屬斯隆的龐大植物標本庫中仍保存著剛伯法在日本蒐集的植物標本，其中一件傘形科植物標本的花、葉分別註有 Ninsin、Folia nindsin 字樣，符合剛伯法的筆跡，也正是他書中使用的拼寫方式。標本下方的三處標註則應出自斯隆的助手約翰·阿曼（Johann Amman, 1707-1741）之手，他曾於 1730-1733 年負責管理斯隆的博物學收藏。其中「Am. 818」對應《異域奇觀》頁 818，此頁所載正是人參。¹¹⁴ 毫無疑問，剛伯法的人參圖便源於該植物。德國植物學家佩特拉-安德莉亞·欣茨（Petra-Andrea Hinz）曾對剛伯法搜集的日本植物標本進行研究，上述標本被鑑定為 *Sium sisarum* L.（圖 32 ②）。¹¹⁵

¹¹³ Edwin Rose, “Engelbert Kaempfer,” in *The Collectors: Creating Hans Sloane’s Extraordinary Herbarium*, ed. Mark Carine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2020), pp. 186-191.

¹¹⁴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由於剛伯法搜集的植物標本經過了重新整理和黏貼，此標本頁上呈現了兩種不同的植物，僅有下方的兩個葉片與左側的花序來源於 *Sium sisarum* L.，另有數個同種植物的葉片、花序標本被黏貼在另一頁，編號 BM000815504。斯隆及其助手對植物標本收藏進行大量整理標註工作，最為重要的是將標本與當時植物學著作中的條目進行對應。在圖 32 ② 所呈現的標本中，左下角的標註所指為著名植物學家約翰·雷（John Ray, 1627-1705）的名著《植物志》（*Historia Plantarum*）。該書分三卷，前兩卷分別出版於 1686、1688 年，頁碼連續；第三卷出版於 1704 年，頁碼獨立編排，為補充卷。標本中的「R. S. 647」即第三卷的頁 647，對應內容摘錄自皮索對 ninzin 的記載；「R. H. 1338」即前兩卷的頁 1338，對應內容摘錄自 Breyne 等人對 Ninzi、Gensing 或 Gin-sem 的描述。斯隆所藏該書版本有著非常多的標註，並將其作為查找植物訊息的工具書使用，在頁 1338 文字夾縫中有手寫標註「Kempf. am. exot. 818」（同樣是約翰·阿曼的筆跡），亦指剛伯法 *Amoenitatum Exoticarum* 一書頁 818。（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藻類、真菌與植物部首席研究員 Mark Carine 幫助我詳細了解斯隆的植物標本收藏及相關研究，斯隆標本收藏研究專家 Bradley Lewis Scott 為確定標註筆跡的書寫者提供了關鍵的訊息，在此特別致謝）關於斯隆對 *Historia Plantarum* 的使用與標註，參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相關研究與說明（<https://data.nhm.ac.uk/dataset/sloane-historia-plantarum>，讀取 2026.07.21）。

¹¹⁵ Petra-Andrea Hinz, “The Japanese Plant Collection of 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in the Sir Hans Sloane Herbarium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Bulletin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Botany Series* 31.1 (2001): 27-34.



①

②

圖 32：剛伯法人參圖及其植物標本

(①Kaempfer, *Amenitatum Exoticarum*, p. 819. Courtesy of the Smithsonian Libraries and Archives; ②Specimen of *Sium sisarum* L. collected by Kämpfer [Barcode: BM000815675]. © The Truste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Shar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該植物一般對應的英文名為 *skirret*，中文為澤芹。*Skirret* 在近世歐洲是一種常見的作物，其塊根常被作為食物，剛伯法亦曾提到他所見的「人參」葉片與 *Sium sisarum* 相似。¹¹⁶ 澤芹在中國古代本草中很少見，江戶時代日本文獻中也沒有以此命名的藥物。但剛伯法描述的一個細節可提供極為關鍵的線索，他提到：「在小枝的腋下生長出芽，可能一個或多個，略呈錐形，大小如豌豆，草本，稍

¹¹⁶ *Skirret* 在近世歐洲飲食中的地位逐步被馬鈴薯替代，參見“*Skirret (Sium Sisarum, Linn.)*,” *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147/148 (1899): 39-42。該文亦提到日本曾發現一種類似的藥用植物，這明顯便是剛伯法搜集的「人參」。

微有疣，肉質，味道淡、略甜。如將其種到土裡，或者自然掉落地上，它就會按照種子的特性成長為新的植株。」¹¹⁷ 這句話描述的是植物葉腋中生長的珠芽。在中日本草中記載有一味藥物「零餘子」，即薯蕷葉腋中的珠芽。《廣參品》中載有「ムカゴ人參」，即「零餘子人參」，其得名原因便是「葉間別結實，如薯蕷之零餘子」；又因「開花碎白、張傘，頗似芹子花，故又名芹人參」。¹¹⁸ 田村藍水則將「芹人參」和「零餘子人參」作為兩個單獨的品類分別繪製，前者強調葉似芹菜、花似防風，後者圖繪特別突出葉腋中之珠芽而未描繪花序（圖 33）。¹¹⁹ 無論如何，雖然繪圖詳略及風格不同，但仍可看出田村氏所繪植物與剛伯法的「人參」圖有相似之處。



①芹人參



②零餘子參

圖 33

（田村藍水，《人參譜》卷 4）

¹¹⁷ Kaempfer, *Amoenitatum Exoticarum*, p. 821.

¹¹⁸ 松岡玄達，《廣參品》，頁 11b-12a。

¹¹⁹ 田村藍水，《人參譜》卷 4。田村氏記載芹人參的正名為藁本，澤芹亦有別名「山藁本」，但當今中醫藥界一般認為不能作為正品藁本使用。

綜上所述，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歐洲人在日本所見的「人參」實際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植物。其一為 *Silene firma* Sieb. & Zucc.，日本稱作薩摩人參，對應中國本草中的女婁菜；其二為 *Sium sisarum* L.，日本稱作零餘子人參或芹人參。當然，由於文本與圖像的局限，古今植物名稱或難以做到完全對應。但以上考據至少可證明當時日本存在兩種人參的代用植物，它們常被當作人參介紹給來日的歐洲博物學家。這當然並非日本人有意隱瞞真正的「神藥」，畢竟當時日本尚未成功引種「朝鮮人參」，日本本草學者同樣正在面對本土龐雜的人參代用品種，試圖辨識出「真正的」人參。以上兩種植物雖非「真」人參，但其在歐洲人認識人參的歷史中曾發揮重要作用。這也進一步證明了考察圖像資料的價值，如僅讀文字描述難以發現大量歐洲學者談論的人參實際並不是現今植物學中的五加科人參。

三・時間性與典範性：圖像中的知識呈現

釐清了歐洲人參圖像的源流及物種，另一個重要的分析角度便是圖像如何形塑知識建構。近代早期歐洲博物學已發展成為一種「描述的科學」，對動植物的文字與圖像描述至十七世紀後半葉已頗為成熟。¹²⁰ 在博物學家開始大量討論人參時，歐洲已接近林奈建立現代植物分類學的前夜。如以繪圖風格而言，歐洲出現的人參圖大多具備寫實主義的風格。已有不少研究指出，作為一種「認知型圖像」，博物學圖像的寫實並不意味著是對某一棵植株的忠實描繪，而是代表一種典型的植物形象，意圖傳達該植物所具備的各種植物學特徵。為達到此目的，常常會做出一些看似寫實卻與忠實描繪背道而馳的行為，比如將花苞、開花、結實等不同成長階段的特徵繪製在同一植株，或將花朵、種子等重點部分單獨以放大的形式呈現更多細節。¹²¹ 以此觀之，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歐洲大多數人參圖皆是一種靜態描述，尚未重點呈現植物不同階段的特徵，亦未展現花與種子的細節。總體而言，人參圖形制多種多樣，缺乏一種典範，這與當時歐洲人所掌握的

¹²⁰ Brian W. Ogilvie, *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 Natural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urop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¹²¹ Daston, "Epistemic Image"; Sachiko Kusakawa, *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 Image, Text, and Argu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Human Anatomy and Medical Bota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人參知識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各種不同、乃至互相矛盾訊息交織的情況下，歐洲博物學界尚未形成對人參的權威性、典範性認知。除了上文所述的對人參莖、葉、花等地上部分的探尋，歐洲學者對人參根部的描繪同樣具有多樣性。他們雖然普遍得知人參名稱的由來是類似人形的根部，但尚未在標本和圖像中找到明確證據。雖然商人帶回的人參根部大多具有兩支根的形態，但從中國書籍和實際考察中所得圖像卻並非總是如此。因此，在根部的描繪上我們能看到有無支根的紡錘形、兩支根、多支根、乃至聚成團的塊根。

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歐洲對人參的知識尚在成形當中，但這種狀況很快便會改變，1712 和 1713 年出現的兩幅人參圖便是其轉折點，剛伯法的人參圖是其中之一。他大多數訊息來自本草書或日本學者，他得知真正的人參產自朝鮮和中國山西等地；據說人參在日本京都的藥園也有種植，不過生長時間較短。與前人相同，他在描述人參時也會與歐洲人所熟悉的植物進行對比，他說人參根部有類似歐防風（*Pastinacae luteae*）的氣味，葉片與澤芹（*Sium sisarum*）相似，莖部的分節類似甘蔗。但他的圖繪中兩個元素是此前人參圖所不具備的：他第一次將不同生長階段描繪了出來，並且仔細呈現了花與種子的形態。這種繪圖方式一方面體現出十八世紀歐洲植物學的發展，花序、種子等具備繁殖功能的植物器官受到重視；另一方面，對「人參」不同生長階段的呈現亦展示作者實地觀察的結果。雖然歐洲近世植物圖像亦包含時間性特徵，但通常做法是將花、實等不同階段出現的特徵繪於同一植株。剛伯法的插圖將植株的生長分了三個階段：幼苗期、成長期、成熟期，三個階段根部分支逐漸增多，葉片形狀和結構也有變化。他曾將「人參」種子帶回歐洲培植，雖未能繁育出子代，但完整觀察到了植株的生長過程，因而在他製作的日本植物圖像裡，「人參」是唯一包含時間性描繪的案例。

首個將五加科人參圖像傳到歐洲的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杜德美。他抵達中國後受到康熙皇帝的重用，受命參與繪製大清地圖，自 1708 年起，他與其他幾位傳教士共同從長城沿線開始測繪工作，逐步深入東北地區。¹²² 他在東北與朝鮮的邊界附近見到了人參，他親身試驗了藥效，由於其對抗疲勞和恢復精力的神奇效果，杜德美開始留意考察人參，並寫信詳細介紹了人參的療效和植物形態。這封信於 1711 年從北京寄出，並被收錄於 1713 年出版的《耶穌會士書簡集》中，英國皇家學會主辦的《哲學匯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隨即發表了該信

¹²² Mario Cams,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 c.1685-1735* (Leiden: Brill, 2017).

的英譯文。¹²³ 为了更好地瞭解杜德美的製圖策略，他在信中對人參的形態描述值得被詳細引用：

A 顯示的是這種植物的根，清洗後呈白色，正如其他植物的根部一樣，表面會有些許的凹凸不平。B、C、D 展現了莖的長度和粗細；其表面平滑呈圓柱形，顏色深紅，但在 B 點會發白，因為此處更接近地面。D 是一種節狀結構，由四個呈放射狀的分支構成，都從同一個中心長出來，分支間的距離均等且處在同一高度，分支的下部是綠色的，間雜有白色；上部與莖相似，都呈深紅色，接近桑葚的顏色。這兩種顏色在兩側漸變並自然融合在一起。正如圖中所示，每個分支有五個葉片。令人驚訝的是，這些分支互相之間距離等分且處在同一平面，如此所有葉片就形成了一個近乎平行於地面的圓形。

儘管我完成的圖樣僅在 F 處繪製了一個分支的葉片，但任何人都很容易根據同一樣式構想出它剩餘的部分。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大又如此纖薄的葉片：它們的紋路清晰可見，正面還長有細小的白毛。紋路之間的葉片在中間部分略微凸起，稍高於紋路。葉片正面是深綠色，背面呈閃亮的淺綠色。所有葉片邊緣都呈精確分布的鋸齒狀。

從分支的中心 D 點長出了第二段莖 DE，非常豎直而平滑，從頭到尾都帶有些白色，支撐著一束圓形果實，果實呈現漂亮的紅色。一束果實長有 24 顆漿果，我在此畫出了兩個，用 9.9 來標示。紅色果皮又薄又光滑，包裹著白色而柔軟的果肉。這些漿果成對生長（有時也有單個生長的），每個裡面都有兩個堅硬的果核，並且彼此分離，大小和形狀與常見的扁豆相似，只不過果核不像扁豆一樣有薄邊，它各處都是一樣的厚度。每個漿果都由一個平滑、均勻而精巧的小枝所支撐，小枝的顏色與我們的小紅櫻桃一樣。所有小枝從同一個中心長出，分布正如球形射線一樣，這也讓漿果束呈現圓形。這種果實並不好吃。果核與其他常見的水果一樣，堅硬且內含果仁。果實往往與支撐它的小枝在同一平面上，果實的形狀並非圓形，而是兩側略扁。如果果實成對而生，那麼在中間的連接處會有凹陷，頂上長有小鬚，與懸掛的小枝相對。漿果變乾後僅剩下枯萎的果皮緊覆於果核之上，顏色深紅乃至近乎黑色。

¹²³ Father Jartoux (Pierre Jartoux), "The Description of a Tartarian Plant, Call'd Gin-Seng; with an Account of Its Virtues. In a Letter from Father Jartoux, to the Procurator General of the Missions of India and China. Taken from the Tenth Volume of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y Jesuits, Printed at Paris in Octavo, 1713,"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28 (1713): 237-247.

這種植物每年都會枯萎然後重生。它的生長年份可從其生長的莖桿數量看出來，每年莖桿枯萎時都會留下痕跡，在 b.b.b 和 c 處可以看到。由此可以看出 A 根生長了七年，H 根生長了十五年。

我沒有見到花，所以無法提供任何描述。有些人說它的花是白色、很小；另一些人言之鑿鑿，聲稱這種植物根本沒有花，沒有人見到過。我寧願相信它的花太小、太不引人注意了，所以他們從未留意到。從這一觀點中我可以確信，那些尋找人參的人只關心根部，通常都會忽略乃至扔掉無用的其他部分。

.....

儘管我描繪的植物有四個分支，但也有些只有兩個分支，也有些長有三個分支，有些有五到七個分支：最後一種是最漂亮的。不過每個分支上只有五個葉片，圖中所示也是如此，除非葉片被偶然損壞了。植株的高度與其大小和分支數量成比例。沒結果實的通常又小又矮。

對於根部而言，越大、越均勻、支根和根鬚越少的便是越好的。因此用字母 H 標示的根是最受歡迎的。我不知道中國人為何叫它「人參」，這個名字顯示它是人形的。不僅是我，其他刻意尋找和研究過人參的人都找不到類似人形的人參。儘管與其他植物的根相比，這種植物可能偶爾會長出一些奇怪的根部。¹²⁴

杜德美的文字描述對圖像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解釋說明，雖然表面上看去杜德美的圖像是在「寫實」，但它並非杜德美親眼看到的任何一株植物，而是他通過觀察形成的典範形象（圖 34）。從文字說明可以看出，在某些情況下，製圖者不得不做出選擇。首先，杜德美畫出了四枚複葉，但他同樣提到二至七個分支都是可能的。一個好的植物學圖像一定不是用窮舉法把所有可能的個案都繪製出來，而是做出「正確」的選擇。杜德美沒有選擇他認為最漂亮的五到七極的人參作為「標準」圖像，而是他所見最多的四極，而且要排除葉片被偶然損壞的情況。其次，杜德美僅畫出了一枚複葉結構作為示例，其他留給讀者自行想像；果實也是如此，僅畫出兩個。這種必要的省略可避免畫面過度擁擠，妨礙重要植物特徵的呈現；同時也是以少數典型範例表現整體的製圖策略。

¹²⁴ Pierre Jartoux, "Lettre du Père Jartoux au Père Procureur Général des Miss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i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Tome 10 (Paris: Chez Jean Barbou, 1713), pp. 159-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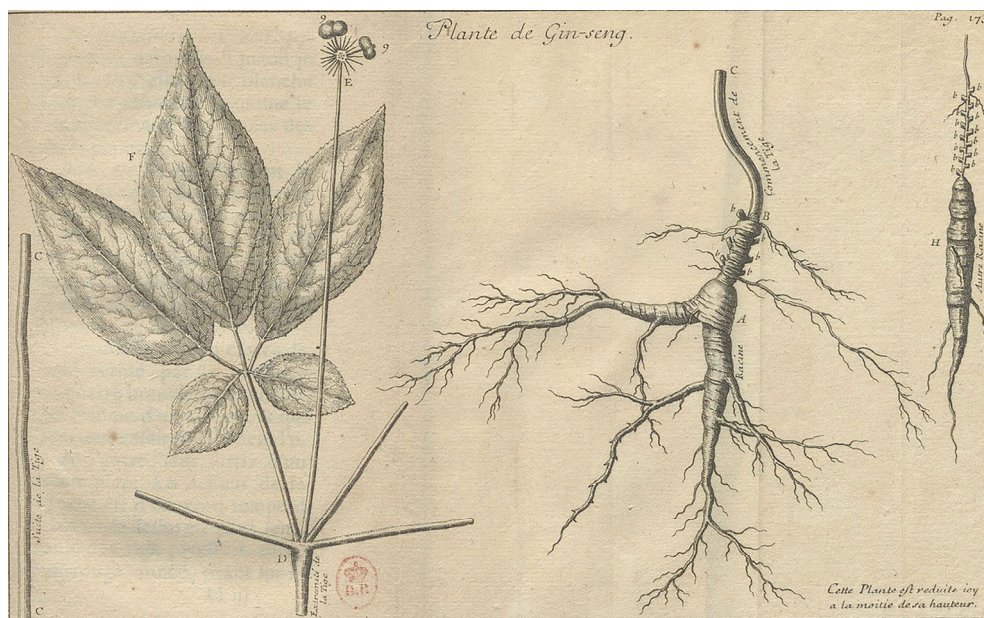


圖 34：杜德美人參圖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p. 173.

Courtesy of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最後，根部形狀的選擇尤為關鍵，圖中畫出了兩個根：一個呈較為完美的紡錘形，沒有大的分支，鬚根很少，這明顯是杜德美描述的「最受歡迎的人參」；但杜德美似乎並不認為這是最「普遍」的人參形象，圖中佔據最顯眼位置、有著更多細節的人參根部幾乎從頭部開始就分成了兩個大的支根，且根鬚眾多，上面有蘆頭與莖相連。雖然杜德美認為人形人參可能並不存在，但它還是選擇了最接近人形的、主根分為兩支的人參作為其最普遍的形象，這一點和同時代中國人繪製人參的思路不謀而合。

雖然以後見之明來看，杜德美的圖像才是真正的五加科人參；但在當時的博物學家看來，剛伯法的訊息同樣有著較高的可信度。接下來的發展卻讓天平迅速向杜德美傾斜，他在信中推測北美可能生長有人參，不久之後，在北美易洛魁人之中傳教的法國耶穌會士拉菲托（Joseph-Francois Lafitau）讀到了杜德美的書信，並於 1716 年發現了美洲人參（即現今所謂西洋參或花旗參）。¹²⁵ 或許為了

¹²⁵ 西洋參發現的歷史，參見韓琦，《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第三章。

證明他發現的植物與杜德美描繪的是同一物種，他繪製的圖像同樣選用了兩分支的根部形象，其他部位的繪製風格也與杜德美的人參圖非常相似。這種選擇深刻影響了此後歐美植物學家對西洋參的圖像表現，直到十九世紀的西洋參圖像仍以兩分支的根部形態最為普遍。

美洲出產人參的消息震動了歐洲的博物學界，隨之而來的便是歐洲人參的知識中心迅速從荷德轉向了英法。依靠北美的殖民地，英法兩國的博物學家可以更為便利地進行人參採集與研究。到了十八世紀中葉，英國植物學家已經將來自中國和美洲的 *ginseng* 和來自日本的 *ninjin* 進行了區分。¹²⁶ 1747 年，以研究新大陸動植物聞名的英國植物學家馬克·蓋茨比（Mark Catesby, 1683-1749）出版了他代表作的第二卷，在介紹美洲人參的部分，他再次強調杜德美圖像的重要性，並且附上一幅製作精美的圖版：在一株三桠五葉的人參植物下站立著一隻墨西哥三聲夜鷹，為了彌補杜德美沒有看到人參開花的遺憾，他還特意做了補充；有趣的是，他仍把根部繪製成了類人形。¹²⁷ 沒有證據顯示蓋茨比了解中文文獻對人參的描繪，但他所繪製的圖像卻與中國本草中人參的典型形象不謀而合，即「根如人形」與「三桠五葉」。由於此圖將新大陸兩種代表性的動植物並置，它在美洲博物學中十分出名（圖 35）。大概也是在此前後，歐洲人參研究史的起點被重新定位於杜德美在東北觀察到人參的 1709 年，剛伯法、門澤爾、克萊耶等人的名字逐漸被遺忘。

¹²⁶ Sul, *A Global History of Ginseng*, chapter 3.

¹²⁷ Mark Catesb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 vol. 2 (London: Printed at the expence of the author, and sold by W. Innys and R. Manby, at the West End of St. Paul's, by Mr. Hauksbee, at the Royal Society House, and by the author, at Mr. Bacon's in Hoxton, 1734-1747), appendix p. 16.



圖 35：美洲人參與墨西哥三聲夜鷹圖

(Catesb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 vol. 2, appendix p. 16.
Courtesy of the Smithsonian Libraries and Archives)

歐洲科學史研究中將植物學命名和分類這種看似與價值無涉的科學規範視為一種「語言帝國主義」，它抹去了土著的知識傳統、凸顯歐洲科學認知的優越性。¹²⁸ 相較而言，圖像卻更易被視作客觀、價值中立的描繪。但從人參圖像的案例中，亦可見東西知識體系間的不平等。中國本草書中的圖繪僅在兩位德國漢學家的作品中出現過，此後的博物學家並未重視，反而是克萊耶在日本實地考察後製作的圖像受到了諸多學者的關注，皮索人參圖亦曾被用以參照與比較。郎弗安斯的手稿中原有兩幅根據中國本草書製作的圖像，但在其身後出版時也遭編者和出版商摒棄。來自中國書籍的人參圖從未被作為準確、客觀的知識被歐洲博物學家檢驗或接受。在兩種繪圖系統之中，歐洲學者更傾向於相信曾有實地考察經驗的歐洲博物學家的作品，儘管——在上文已經證明——有些物種並非「真正的」人參。至十八世紀後半葉，歐洲的人參圖像製作多基於對美洲人參的觀察。以圖像和形態描述為媒介，東亞社會和美洲土著使用的兩種藥物皆被冠以 *ginseng* 之名，它們被剝離了原本的知識脈絡，成為一種跨越地域的物種與知識客體。

結語

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全球貿易與知識探索中，人參並非一個單獨的物種，而五加科的 *Panax ginseng* C.A.Mey. 最終被確認為唯一真品人參是全球物質與知識互動之中產生的結果。¹²⁹ 東西方博物學對人參的探索不僅顯示跨文化知識交流中的權力結構，亦展現出文本權威與實地考察訊息之間的張力。雖然中、日、歐三地對人參物種與知識的探索皆有從書本知識到實地調查的轉型，但文本的權威性並未完全消解，「根如人形」與「三桠五葉」的敘述仍不同程度地體現在圖像描繪之中。在此，圖像不僅是知識傳播的載體，更是知識溝通的手段與知識生產的媒介。在人參知識的全球傳播中，日、歐學者將圖像作為比文字記錄更為準確、客觀的描繪，因而將圖像轉換成一種符號，一個物種的代表。長期存在於中

¹²⁸ Londa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¹²⁹ 關於本草全球傳播的更多案例，參見高晞、何安娜編，《本草環球記：5 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北京：中華書局，2023）；安洙英，《18、19 世紀藥材知識的跨文化傳播：一部從中國出發的自然知識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國本草中的「道地」與「性味」觀念則被隱去，排除出客觀知識的範疇。在明清中國醫學知識體系中，不同產地的藥物會有性味的區別。宋代至清代本草書常以產地為人參命名，市場中也以不同產地來區分品質。對道地的關注也被江戶早期的日本本草學家繼承，因而會將竹節參橫生的根部視作人參因地土不同所產生的變異形態；然而南橘北枳的擔憂在人參引種成功後被悄然消解，田村藍水斷言人參即使種植百次，花色、功效也不會改變。¹³⁰ 歐洲博物學家的關注點亦為形態，而不曾質疑在日本生長的人參是否與中國人參有所不同。

人參圖像的製作及其表現方式可被視作一種認知焦慮（epistemic anxiety）的體現：即如何辨別及描繪「真正的人參」。¹³¹ 此種認知焦慮在近世中、日、歐三地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又呈現出不同的樣態。明清中國醫家一方面關注宋代傳世四種人參圖的辨析，另一方面不得不應對市場中複雜的商品類型對人參辨偽提出的新挑戰。日本本草學者則在本土更為龐雜的偽品、代用品中試圖釐清人參的品種，進而推動本土化培育。因處於人參的主要產地，朝鮮王朝的學者及醫家群體中少見類似的認知焦慮，這或可部分解釋其缺乏人參圖像描繪的現象。有別於各種偽品充斥的近世中、日人參市場，朝鮮對人參的植物特徵與品種並無過多爭議。十七世紀的歐洲學者則因地理區隔難以掌握第一手的訊息，因而不得不通過各種間接途徑搜集訊息，在紛繁歧互的知識中探尋人參的典範形態。

雖然皆有辨識與描繪真人參的目的，東西方在圖像呈現方式上卻出現明顯的差異。相較於近世歐洲博物學圖像的發展，明清中國的本草書籍往往缺乏精緻的

¹³⁰ 田村藍水，《朝鮮人參耕作記》，頁 23b-24a。

¹³¹ 本文對認知焦慮的用法借用自達斯頓與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其作品中也偶有認知憂慮（epistemological worries/fear）的說法，它指代科學群體在認識自然的追求中產生的問題焦慮，即何謂客觀準確的知識、如何獲得及表現客觀準確的知識、如何排除研究者本身的主觀性。它雖非嚴格定義的概念，但在分析不同「客觀性（objectivity）」表達方式的歷史形成脈絡時尤為關鍵。參見 Daston and Galison, *Objectivity*, pp. 34-35, 48-49。此外，栗山茂久亦在中西身體史的經典研究中將各自文化中對「虛」與「過剩」的憂慮或恐懼（fear）作為不同身體觀形成的關鍵因素，參見 Shigehisa Kuriyama, “The Imag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History of Embodied Experience: The Case of Chinese Views of the Viscera,”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History of Bodily Experience*, ed. Shigehisa Kuriyama (Kyo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2001), pp. 17-29; Shigehisa Kuriyama, “The Forgotten Fear of Excrement,”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 38.3 (2008): 413-442。

寫實性插圖。¹³² 而人參的案例或可為這一圖像層面的「認知分流」提供部分解釋。相較於歐洲植物圖像對典範性的追求和細節的描繪，中國本草中的人參圖則更像一種示意圖，它不追求完美的形似而刻意突出代表性的特徵。達斯頓指出歐洲近世植物製圖的發展源於博物學家面對形態各異的自然事物時產生的認知焦慮。對明清中國醫家而言，更為重要的焦慮在於市場中藥物真偽的鑑別，而最常見的作偽手段便是以「形似」的次品、偽品充當優質的真品，因而鑑別知識的關鍵並不是在千變萬化的自然事物中總結典型特質，而是在形似的品類裡根據一兩個突出特徵判斷真偽與品質。¹³³ 對中國醫家而言，一幅栩栩如生的植物繪圖或許具備較高的審美價值，但在認知層面卻不一定是更好的選擇：過度的細節描繪可能會淹沒真正重要的特徵。

明清本草書對宋代潞州人參圖的修訂有兩處格外突出：一是將輪生的四桠改為錯落有致的互生桠，這雖偏離了實際形態但讓桠葉數量的展現更為清晰；二是將原本繁亂的根鬚省略，更清晰地呈現類人形的根部。商品人參圖的描繪亦然，它們雖非精準的描繪，但特別突出了蘆頭、紋路等關鍵特徵。而歐洲的人參圖曾出現了兩種典範：一是十七世紀末在克萊耶、普拉肯內特、郎弗安斯作品中反覆出現的形態；二是杜德美的人參圖，它奠定了十八世紀歐洲主流人參圖像的基本特徵。日本對人參的圖像表現則以田村藍水為界，此前明顯更多接受中國的人參圖像及知識，而此後則借鑑了西方圖繪的表現形式。一言以蔽之，在近世植物圖像的製作上，歐洲在實踐觀察中形成的人參典範圖像被不斷複製，中國的人參圖像則往往在一個權威文本提供的圖像基礎上進行修訂和增改；在觀看方式上，歐洲在同種植物的多樣形態中尋找共性，中國則較少關注整體與細節的形似而注重關鍵特徵。雖然僅以人參的個案難以推演至東西方博物學的普遍差異，但作為近世東亞最具代表性的藥物，對人參圖像的探索仍能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可能性的方向。

（本文於民國一一四年三月四日收稿；同年九月十一日通過刊登）

¹³² 當前中國本草圖像研究中對《救荒本草》的寫實圖像及《本草品彙精要》、《補遺雷公炮炙便覽》中精美的彩繪圖像尤為關注，但這也正說明此類圖像在明清本草中並不多見。參見 Vivienne Lo and Penelope Barrett, eds., *Imagining Chinese Medicine* (Leiden: Brill, 2018), pp. 151-160, 209-214。

¹³³ 明清市場中的藥材辨偽方法參見 Xiaomeng Liu, “Sensing as Knowing: Medicines, the Senses, and Practical Experti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6.1 (2023): 55-67。

劉小濤

後記

本文的構想受益於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東亞海域史」讀書會，在撰寫與修訂過程中曾得梁其姿、金宣旻、王錦秀、陳明、董少新、劉序楓、橋本毅彥、楠川幸子、Marta Hanson、Anne Gerritsen、Mark Carine、Bradley Lewis Scott、王侃良、徐冠勉、金珏、安洙英、辜韻汀、陳思言等師友的指教與幫助，又承蒙編委會與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指正，在此謹致謝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下津元知，《圖解本草》，貞享二年田中理兵衛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丹羽正伯，《增補庶物類纂》，享保年間寫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王文潔彙校，《新刻太乙仙製本草藥性大全》，明萬曆十年陳氏積善堂刊本，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藏。
- 王圻、王思義編，《三才圖會》，明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王繼先校訂，《紹興校定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畫》，江戶寫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加藤謙齋、加藤玄順，《和漢人參考》，延享五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平住專庵、樗村有稅子，《唐土訓蒙圖彙》，享保四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平賀源內，《物類品隲》，寶曆十三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田村藍水，《人參譜》，寫本，元文二年序，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田村藍水，《朝鮮人參耕作記》，明和元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寺島良安，《和漢三才圖會》，正德五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朱櫛，《救荒本草》，明萬曆十四年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朱櫛著，王錦秀、湯彥承譯注，《救荒本草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朱彝尊，《明詩綜》，清康熙四十四年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 伴蒿蹊，《近世畸人傳》，寬政二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何鎮，《本草綱目類纂必讀》，清康熙十二年古延毓麟堂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李中立，《本草原始》，明崇禎永懷堂刊本，麻薩諸塞州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李中立，《本草原始合雷公炮製》，清乾隆十九年存誠堂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李時珍，《本草綱目》，日本江戶覆刻明崇禎武林錢衙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李時珍，《本草綱目》，明萬曆二十一年金陵胡承龍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和田長純，《人參辨》，寬政六年寫本，東京：研醫會圖書館藏。

- 岩崎灌園，《本草圖譜》，文政十三年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服部範忠，《人參譜》，寫本，享保十二年序，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服部範忠，《藥圃圖纂》，寫本，享保十二年跋，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松岡玄達，《廣參品》，寶曆十一年刊本，東京：東京大學圖書館藏。
- 倪朱謨，《本草彙言》，清順治二年有文堂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唐慎微，《大觀本草綱目全書》，明萬曆六年歸仁齋刊本，柏林：柏林國家圖書館藏。
- 唐慎微，《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收入《四部叢刊初編》第 376-387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據蒙古定宗四年張存惠晦明軒刻本影印。
- 張恕等修，光緒《鄞縣志》，清光緒三年刊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陳三友校正，《鼎雕徽郡原板合併大觀本草炮製》，明萬曆三十一年鄭氏書林寶善堂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陳嘉謨，《圖像本草蒙筌》，明崇禎元年萬卷樓刊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陸烜，《人蔘譜》，收入《梅谷十種書》，清乾隆刊本，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 飯沼慾齋，《新訂草木圖說》，明治七年刊本，劍橋：劍橋大學植物園圖書館藏。
- 黃叔燦，《參譜》，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稻生若水，《本草圖翼》，正德四年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稻生若水，《炮炙全書》，元祿五年刊本，京都：京都大學富士川文庫藏。
- 鄭昂，《人參圖說》，抄本，上海：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 鄭昂，《人參圖說》，清嘉慶七年荻浦書屋刊本，寧波：天一閣藏。
- “Skirret (*Sium Sisarum*, Linn.).” *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147/148 (1899): 39-42.
- Breynius, Johannes Philippus. *Dissertatio Botanico-Medica de Radice Gin-Sem, seu Nisi et Chrysanthemo Bidente Zeylanico Acmeilla Dicto*. Lugduni Batavorum: apud Abrahamum Elzevier Academiae Typographum, 1700.
- Catesby, Mark.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 vol. 2. London: Printed at the expence of the author, and sold by W. Innys and R. Manby, at the West End of St. Paul's, by Mr. Hauksbee, at the Royal Society House, and by the author, at Mr. Bacon's in Hoxton, 1734-1747.

- Cleyer, Andreas (Cleyeri, Andreae). “De Radice Gensingh.” *Miscellanea Curiosa, sive Ephemeridum Medico-Physicarum Germanicarum Academiae Naturae Curiosorum* 4 (1685-1686): 3-6.
- Cleyer, Andreas, and Christian Mentzel. *Flora Japonica*. 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Libri picturati 41/42. Late 17th century.
- Grew, Nehemiah. *Musaeum Regalis Societatis, or, A Catalogue &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arities Belonging to the Royal Society and Preserved at Gresham Colledge*. London: Printed by W. Rawlins, 1681.
- Jartoux, Pierre. “Lettre du Père Jartoux au Père Procureur Général des Miss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I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Tome 10. Paris: Chez Jean Barbou, 1713, pp. 159-185.
- Jartoux, Pierre. “The Description of a Tartarian Plant, Call’d Gin-Seng; with an Account of Its Virtues. In a Letter from Father Jartoux, to the Procurator General of the Missions of India and China. Taken from the Tenth Volume of Letters of the Missionary Jesuits, Printed at Paris in Octavo, 1713.”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28 (1713): 237-247.
- Jaucourt, Louis de. “Ginseng.” In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7. Paris: Briasson, Bavid l’aîné, Le Breton, Durand, 1757, pp. 664-667.
- Kaempfer, Engelberto. *Amoenitatum Exoticarum Politico-Physico-Medicarum Fasciculi V: Quibus Continentur Variae Relationes, Observationes & Descriptiones Rerum Persicarum & Ulterioris Asiae: Multâ Attentione in Peregrinationibus per Universum Orientem Collectae*. Lemgoviae, Typis & impensis Henrici Wilhelmi Meyeri, aulae Lippiacae typographi, 1712.
- Mentzel, Christian (Mentzelii, Christiani). “De Radice Chinensium Gin-Sen.” *Miscellanea Curiosa, sive Ephemeridum Medico-Physicarum Germanicarum Academiae Naturae Curiosorum* 5 (1686-1687): 73-79.
- Mentzel, Christian. *Miscellanea Sinica: Lexicum Characteristic Sinico Latinum; Grammatica Sinicae Linguae Universalis Continens; et Varia*. Biblioteka Jagiellońska, Ms. Sin. 10. Late 17th century.
- Mentzel, Christian. *Herbarium Chinense*. Biblioteka Jagiellońska, Ms. Sin. 15. Late 17th century.
- Mentzel, Christian. *Ausführlicher Bericht von der Wurtzel GIN-SEN: Auß den Chineesischen Texten, Gelährter Männer Gezeugnüssen, und Selbst Eigener Erfahrung*. Biblioteka Jagiellońska, Ms. Sin. 18. Late 17th century.

劉小蓀

- Müller, Andreas. *Hebdomas Observationum De Rebus Sinicis*. Coloniae Brandenburgicae: Schultzius, 1674.
- Pisonis, Guilielmi. *De Indiae Utriusque re Naturali Et Medica*. Amstelædami: Apud Ludovicum et Danielelem, 1658.
- Plukenetii, Leonardi. *Phytographia seu Stirpium Eikones Fideliter & Exquisite ad Vivum Delineatae Aenisque Tabulis Illustratae in Quibus Novae Plures & Exoticae Plantae a Nemine Hactenus Animadversae Nunc Primum Proponuntur; necnon Aliae Quaedam apud Neotericos Dubiae Atque Obscurae (mutatis aliquando nominibus prout res ipsa postulat) Perspicua Brevitate Dilucidantur. Pars altera [2]*. Londini: Sumptibus Autoris, 1691.
- Rumphius, Georgius Everhardus. *Amboinsch Kruidboek, boeken I-XII, met het Auctuarium of Toegift*.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ies, BPL 314. Late 17th century.
- Rumphius, Georgius Everhardus. *Het Auctuarium, ofte Vermeerdering, op het Amboinsch Kruid-boek*. Te Amsterdam: by Mynard Uytwerf, en de wed. S. Schouten en Zoon, 1755.
- Tachard, Guy. *Voyage de Siam, des Peres Jesuites, Envoyez par le Roy aux Indes & à la Chine: avec Leurs Observations Astronomiques, et Leurs Remarques de Physique, de Géographie, d'Hydrographie, & d'Histoire*. Paris: Chez [brace] Arnould Seneuze, rue de la Harpe, à la Sphere et Daniel Horthemels, rue de la Harpe, au Mécenat, M. DC., 1686.

二・近人論著

方曦閏

- 2020 《華夏圖志：西方文獻中的中國視覺形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王家葵

- 2022 〈本草人參的圖像學考察〉，《美術大觀》2022年7期：95-99。
- 2023 《《本草綱目》通識》，北京：中華書局。

王家葵、蔣淼、胡穎翀

- 2018 《本草綱目圖考》，北京：龍門書局。

安洙英

- 2024 《18、19世紀藥材知識的跨文化傳播：一部從中國出發的自然知識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抵、王秀華編

- 1991 《清代東北參務》，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李敏

- 2017 〈18 世紀日朝筆談的醫學史料研究〉，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醫史文獻專業博士論文。

李健、張瑞賢、張衛、梁飛

- 2011 〈明代坊刻《政和本草》版本研究〉，《中華醫史雜誌》41.3：176-178。

沃夫岡·米歇爾（Wolfgang Michel）

- 2026 〈歐洲人與人參（1600-1740）：知識傳播與意義建構〉，《中醫藥歷史與文化》1.1：93-117。

林莉娜

- 2011 〈班達里沙、蔣廷錫《畫人參花》：康熙宮廷百草之王〉，《故宮文物月刊》343：69-78。

高晞

- 2015 〈十五世紀以來中醫在西方的傳播與研究〉，《中醫藥文化》2015 年 6 期：15-24。

高晞、何安娜編

- 2023 《本草環球記：5 世紀以來全球市場上的藥物、貿易與健康知識生產》，北京：中華書局。

陳明

- 2007 〈異域的形象：《本草品彙精要》中的胡人圖〉，王淑民、羅維前主編，《形象中醫：中醫歷史圖像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頁 101-110。
- 2020 〈筆談與明清東亞藥物知識的環流互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 3 期：81-95。

劉小朦

- 2026 〈參之美惡，有形可繪：鄭昂《人參圖說》的商品分類與繪圖策略〉，《中醫藥歷史與文化》第 8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57-180。

蔣竹山

- 2015 《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療》，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鄭金生

- 2007 〈論本草書中的寫實插圖與藝術插圖〉，王淑民、羅維前主編，《形象中醫：中醫歷史圖像研究》，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頁 83-89。

劉小藤

韓琦

1999 《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及其影響》，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大庭脩

1967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中尾萬三

1933 《紹興校訂本草解題》，京都：春陽堂。

今村軀

1935 《人參史》，京城：朝鮮總督府專賣局。

古賀十二郎

1966 《長崎洋學史》，長崎：長崎文獻社。

永積洋子

1987 《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 年》，東京：創文社。

田代和生

1981 《近世日朝交通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

1999 《江戸時代朝鮮藥材調査の研究》，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

田谷博吉

1963 《近世銀座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仲田勝之助編校

1941 《浮世絵類考》，東京：岩波書店。

安田健

1987 《江戸諸國產物帳：丹羽正伯の人と仕事》，東京：晶文社。

辻達也

1963 《享保改革の研究》，東京：創文社。

岡西為人

1977 《本草概説》，大阪：創元社。

浦部哲郎

2022 〈藥種の国産化：田村元雄の事績を中心に〉，東京：法政大學國際日本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真柳誠、友部和弘

1992 〈中國醫籍渡來年代総目録（江戸期）〉，《日本研究》7：151-183。

瀬尾昭

1976 〈和人參の史的考察〉，《日本東洋醫學會誌》27.4：193-198。

An, Sooyoung

- 2024 “The Japanese Survey of Materia Medica in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Studies of Na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56.2: 239-278.

Appleby, John H.

- 1983 “Ginseng and the Royal Society.”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37.2: 121-145.

Bian, He (邊和)

- 2020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ay, Francesca, Vera Dorofeeva-Lichtmann, and Georges Métaillé, eds.

- 2007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The Warp and the Weft*. Leiden: Brill.

Cams, Mario (康言)

- 2017 *Companions in Geography: East-West Collaboration in the Mapping of Qing China, c.1685-1735*. Leiden: Brill.

Chia, Lucille (賈晉珠)

- 2003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lunas, Craig (柯律格)

- 1998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ok, Harold J.

- 2007a *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7b “Global Economies and Local Knowledge in the East Indies: Jacobus Bontius. Learns the Facts of Nature.” In *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edited by Londa Schiebinger and Claudia Sw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p. 100-118.

Daston, Lorraine

- 2015 “Epistemic Images.” In *Vision and Its Instruments: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ited by Alina Payne.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13-35.

Daston, Lorraine, and Peter Galison

2007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Fan, Fa-ti (范發迪)

2004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as, Peter J. (葛平德)

2015 *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egel, Robert E. (何谷理)

1998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inz, Petra-Andrea

2001 "The Japanese Plant Collection of 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 in the Sir Hans Sloane Herbarium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London." *Bulletin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Botany Series* 31.1: 27-34.

Kajdański, Edward

2017 "Michael Boym's *Medicus Sinicus*: New Facts, Reflections, Conclusions." *T'oung Pao* 103.4/5: 448-472.

Kim, Seonmin (金宣旻)

2017 *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on Korea, 1636-191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uriyama, Shigehisa (栗山茂久)

2001 "The Imag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History of Embodied Experience: The Case of Chinese Views of the Viscera."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Body and the History of Bodily Experience*, edited by Shigehisa Kuriyama. Kyo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pp. 17-29.

2008 "The Forgotten Fear of Excrement."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 38.3: 413-442.

2016 "The Geography of Ginseng and the Strange Alchemy of Needs." In *The Botany of Empir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Yota Batsaki et al. Washington, DC: B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pp. 61-72.

Kusukawa, Sachiko (楠川幸子)

- 2012 *Picturing the Book of Nature: Image, Text, and Argument in Sixteenth-Century Human Anatomy and Medical Bota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e, Hyemin

- 2016 “Louis XIV’s Ginseng: Shaping of Knowledge on an Herbal Medicine in the Late 17th and the Early 18th Century France.” *Uisihak: Korean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 25.1: 111-146.

Liu, Xiaomeng (劉小朦)

- 2023 “Sensing as Knowing: Medicines, the Senses, and Practical Experti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6.1: 55-67.

Lo, Vivienne, and Penelope Barrett, eds.

- 2018 *Imagining Chinese Medicine*. Leiden: Brill.

Marcon, Federico

- 2015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r, Alexander

- 2016 “Knowing images.” *Renaissance Quarterly* 69.3: 1000-1013.

Métailié, Georges (梅泰理)

- 2007 “The Representation of Plants: Engravings and Paintings.” In *Graphics and Text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in China*, edited by Francesca Bray et al. Leiden: Brill, pp. 487-520.

Michel, Wolfgang

- 1991 “Ein Ostindianisches Sendschreiben: Andreas Cleyers Brief an Sebastian Scheffer vom 20. Dezember 1683.” 《独仏文學研究》41: 15-98。
- 2002 “On the Background of Engelbert Kaempfer’s Studies of Japanese Herbs and Drugs.” 《日本醫史學雜誌》48.4: 692-720。

Nappi, Carla (那段)

- 2013 “Surface Tension: Objectifying Ginseng in Chinese Early Modernity.” In *Early Modern Things: Objects and Their Histories, 1500-1800*, edited by Paula Findlen. New York: Routledge, pp. 31-52.

Ogilvie, Brian W.

- 2006 *The Science of Describing: Natural History in Renaissance Europ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劉小朦

Rose, Edwin

- 2020 “Engelbert Kaempfer.” In *The Collectors: Creating Hans Sloane's Extraordinary Herbarium*, edited by Mark Carine.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pp. 186-191.

Schäfer, Dagmar (薛鳳)

- 2011 *The Crafting of 10,000 Thing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chiebinger, Londa

- 2004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l, Heasim (薛惠心)

- 2021 “Ginseng Exhibit of the British Museu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btaining Route and Responses of the Contemporaries.” *Journal of Ginseng Culture* 3: 38-53.
- 2022 *A Global History of Ginseng: Imperialism, Modernity and Orient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Symons, Van Jay

- 1981 *Ch'ing Ginseng Management: Ch'ing Monopolies in Microcosm*. Tempe: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Yoo, Genie

- 2018 “Wars and Wonders: The Inter-Isl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of Georg Everhard Rumphiu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51.4: 555-584.

Picturing the True Ginseng: Ginseng Images and Global Circulation of Herbal Knowledge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Xiaomeng Liu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ginseng emerged as a highly sought-after tonic in East Asian medical practices and a significant commodity in global trade. Physicians, herbalists, and naturalists from China, Japan, and Europe explored ginseng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with images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By focusing on these images, the present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knowledge of ginseng was represented, modified, and codified during its global circulation. In China, two distinct iconographic conventions developed from four herbal illustrations originating in the official pharmacopeia of the Song dynasty: one referenced the illustration of Luzhou 潞州 ginseng, complemented by detailed revisions; the other focused on the depiction of ginseng as a commodity, reflecting knowledge in the marketplace. In early Edo Japan, scholars primarily learned about the plant morphology of ginseng through Chinese works of materia medica. However, after the Kyōhō reforms, the demand for ginseng domestication led scholars to begin depicting ginseng through firsthand observations. Nevertheless, the textual descriptions of “three branches and five leaves” 三桠五葉 from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ontinued to influence bo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ginseng varieties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were illustrated. European naturalists obtained various ginseng images through both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in Japan, seeking to uncover the typical forms of ginseng amidst an overwhelming array of conflicting information. Within this complex historical process, images served not only as vehicles for knowledge transmission but also as agent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While images in European natural history developed a realistic style that represented the typical form of plants by detailing all necessary traits, ginseng images in East Asia tended to foreground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branch-leaf arrangement, root shape, and the rhizome head. This difference in pictorial

劉小朦

strategies reveals an epistemic divergence in the natural history between East and West. As knowledge and images spread globally, significant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ginseng. Various plant species originally classified under the names “renshen” 人參, “ginseng,” or “ninjin” were gradually excluded from these designations, with *Panax ginseng* C.A.Mey. of the Araliaceae family eventually being established as the sole, true ginseng in East Asia.

Keywords: ginseng; image; three branches and five leaves; knowledge production; global history